

The background is a detailed painting of a harbor. On the left, a two-story wooden building with a balcony and a small flag stands on stilts over the water. A sailboat with white sails is docked in front of it. To the right, a tall, white lighthouse with a lantern room at the top stands on a rocky outcrop. Another sailboat is visible in the distance. The water is dark with ripples, and a wooden post with a rope is in the foreground on the right.

中外名人传记百部

ZHONG WAI MING REN ZHUAN JI BAI BU

伏尔泰传

北京圣碟科贸有限公司制作

世界名人传记

伏尔泰传

X X X 编著

目 录

一	童年时代·····	002
二	浪漫而反叛的青春·····	007
三	巴士底狱·····	014
四	俄狄浦斯和亨利亚特·····	017
五	流亡英格兰·····	026
六	哲学通信·····	031
七	西雷岁月·····	036
八	普鲁士王子·····	047
九	宫廷宠臣·····	053
十	逃离凡尔赛·····	060
十一	爱米莉之死·····	068
十二	自然神论与税制改革·····	079
十三	普鲁士王·····	086
十四	狡兔三窟·····	096
十五	卡拉事件·····	105
十六	拉·拜尔事件·····	114
十七	天真汉·····	119
十八	回到巴黎·····	126

一 童年时代

法国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幽默大师伏尔泰，出生于1694年的巴黎。他的出生本身就是他和这个世界开的一个玩笑。他落地时就极孱弱，人们都认为他活不下来，在护士们拍打之下，他微微有了几口气。她们猜：“他顶多活四天。”可没想到他却如此顽强：把病体拖了84年！在这84年中，他坚持不懈地和世界、和人们开着玩笑，“笑和让别人笑”成了他的一个生活信条。他说：“我狂笑，是为了防止疯狂。”他的纵声狂笑笼罩着18世纪的欧洲，有的人听了激奋，有人听的战栗。他的笑给他带来无限的荣耀和敬仰，也同时带来难以计数的困窘和烦扰。这就是伏尔泰——一个特别的、矛盾的人。

伏尔泰的真名叫弗朗索瓦·玛丽·阿鲁埃。有传闻说他是私生子，他本人在他的诗作和信件中也有影射，然而这终究只是别人和他自己的猜测，是不足为据的。他出身的家庭属第三等级，也就是资产阶级。他的父亲弗朗索瓦·阿鲁埃是巴黎夏德莱区法院的公证人，是一个中产者，但他母亲玛丽·马格丽特·德·阿鲁埃身上带有贵族血统，这给这个家庭增添了荣

光。

尽管伏尔泰出生时那样瘦弱，存活后也常常给人造成生命即将结束的假象，但这并不妨碍他头脑的发达。在他的教父夏多纽夫神甫的教导下，他三岁时就能背诵不可知论者卢德的反宗教的诗《摩西亚特》和拉·封丹的《寓言》。他的父亲和哥哥阿尔芒都是让森派信徒，尤其是哥哥阿尔芒极为虔诚。神甫教他背诵的这首反宗教的诗以及家中的环境，使他自小厌恶一切盲目的狂热，并且在以后的战斗中始终旗帜鲜明地反对宗教狂热。而神甫教他背诵的拉·封丹的寓言，对他后来的文学创作也有很大帮助。因此说，伏尔泰幼年时期所受的后蒙教育对他的一生有重大影响，而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的教父夏多纽夫神甫。

10岁时，伏尔泰被送入耶稣会主办的大路易中学。这是一所贵族学校，学校里实行社会等级制度，贵族子弟享有舒适的单人房间，并且带着仆人，而包括伏尔泰在内的资产阶级的子弟则只能住集体宿舍。这种不公正在伏尔泰的心里埋下了后来所主张的人人自由平等观念的种子。

大路易中学的课程主要包括神学、拉丁文、希腊文、历史和戏剧等，课程安排的内容相当过时，完全跟不上当时先进科学技术的发展，与现实和时代脱节。后来，伏尔泰严厉批评了这所学校给他的教育：“我

不知道我所生长的国家的情况，我既不知道祖国的法律和制度，也不知道祖国的需要，对数学和精确的哲学也一无所知。我所知道的只是拉丁文和毫无意义的东西。”

尽管如此，伏尔泰的表现在学校里仍非常突出。他的才华为一些教师所欣赏。卜莱神甫说他“喜欢把欧洲重大的问题放在他的小秤上称过”。他的一些作品被教师们拿出去炫耀。有一次，夏多纽夫神甫把他的一首诗拿给巴黎著名才女、85岁高龄的尼依·德·朗格罗夫人，这位老人非常欣赏小阿鲁埃，觉得他颇有胆量和才华。她在遗嘱中赠给伏尔泰2000里弗，供他购书用。

然而伏尔泰并不是一个规规矩矩的学生。他爱学习，也爱捣乱；爱思考，也爱反叛。大路易中学对学生有时比较苛刻，冬天要等小礼拜堂的圣水缸里的水结了冰才能生火取暖。小阿鲁埃为了表示反抗，把院子里的冰偷偷地放进圣水缸里。另外有一次，在上课时，小阿鲁埃讽刺的话激怒了雷日神甫，神甫走下讲坛，抓着他的领子大吼道：“真见鬼，你总有一天要成为法国自然神论的宣传者。”他的预言还真的应验了。

伏尔泰在中学时，就在戏剧和文学方面显露出的天赋。他12岁时就写了一出悲剧《阿穆利乌斯和努

弥托尔》，并且已善于演戏。他也能写出很优美的诗句。一次，一个老兵到中学来，请求神甫帮他写一首诗献给王爷，卜莱神甫把这项工作交给伏尔泰。后来那位王爷读了诗后，很受感动，给那个老兵发了一笔年金。

由于大路易中学很注重诗学、戏剧和文学的教育，因此不能说在这个学校的经历对伏尔泰毫无帮助。伏尔泰后来的不少思想都是在这一阶段产生的，他在文学、戏剧方面的才华也是在这一时期开始崭露头脚。除此之外，他还和学校的一些教师保持了很好的私人关系。这也是伏尔泰矛盾性格的表现。他一方面反宗教，反对耶稣会，一方面又尊敬、感激那些对自己进行教诲的教师，如卜莱神甫、奥利维神甫等。奥利维神甫比伏尔泰仅大12岁，后来成为欧洲最有成就的拉丁文学者，也是伏尔泰一生中的好朋友。靠着夏多纽夫神甫的提携，同时也靠着他出众的思想，他结识了圣殿集团的伊壁鸠鲁信徒，成为这些王公贵族的座上客。他和他们一起高谈阔论，朗诵自己的诗作，常常赢得满座喝采。老阿鲁埃不愿儿子与这些人来往惹出麻烦，伏尔泰中学毕业后就被送进了法科学学校。然而他的兴趣不在法律上，他的志向是作一名诗人。老父很气愤，认为当诗人就是个废物。但伏尔泰说：“只要有钱就能买到法官的头衔，但买不到诗人

的桂冠。”老阿鲁埃见儿子如此坚决，只好放弃把他培养成一个律师的计划。伏尔泰的教父的兄弟夏多纽夫侯爵正巧这时出任法国驻尼德兰大使，他指定伏尔泰为自己的随员。这样，19岁的伏尔泰第一次离开了法国。

二 浪漫而反叛的青春

伏尔泰作为一名大使随员来到海牙，当时的海牙，相对于欧洲其他地方，政治上要开明一些，没有宗教狂热，思想比较自由，工业也比较发达。虽然伏尔泰抱怨说这里戏剧文化层次较低，不能经常欣赏出色的戏剧，但海牙较开明的政治气氛对他倒是十分适合。再加上他离开了家庭，不再受父亲严厉的管束，这使他感到自己像一只小鸟一样自由。

19岁的伏尔泰到了海牙后，感到该谈一谈恋爱了。恰在这时，他在街上碰到了奥令波。奥令波是一个美丽、纯情的姑娘，在认识伏尔泰以前刚刚被前一个男朋友抛弃。她也来自法国，父亲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而母亲则是一位新教徒。为免受宗教迫害，她的母亲，杜诺阿依哀夫人，带着女儿逃到了荷兰。为维持生计，杜诺阿依哀夫人办了一份小报，名为《精华报》，定期出版，专门刊登有关知名人士的花边新闻和诽谤文字。伏尔泰很瞧不起她，但对她的女儿倒是满腔深情。他不叫她奥令波，而给她起个名字叫潘佩特。在给她的信书中，他写道：“是啊，亲爱的潘佩特，我将永远爱你。虽然最不忠实的爱人也会

这样说，但他们的爱绝非像我的那样基于完全的敬爱之上。我非但爱你的人，且亦爱你的德性。”伏尔泰和奥令波的秘密恋爱和约会进展顺利，但当奥令波的母亲得知这一消息后却大发雷霆。她自己就是因宗教信仰离开丈夫的，不愿女儿再找一个天主教徒。并且她认为伏尔泰并不是真心想娶奥令波为妻，再加上伏尔泰比奥令波还小2岁，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这一切使得她严格禁止女儿和这位法国大使随员继续来往。当她发现她的言语训斥起不到什么作用时，就动手打了奥令波，并跑到大使馆，跪在夏多纽夫侯爵面前，哀求他管教伏尔泰。大使无奈，只好答应把伏尔泰遣送回国。动身之前，先把他软禁在大使馆，以使他无法和奥令波相会。

可是这时恋爱中的年轻人，总能找到办法绕过眼前的障碍。他们通过仆人互递情书，交流彼此的情感。此外，浪漫的伏尔泰还把自己的一套宫廷侍卫的制服送给奥令波，好让她装扮成侍卫到使馆来和自己幽会。于是，每天薄暮时分，使馆外就会出现一个俊俏的年青侍卫，穿着漂亮的服装，风度翩翩，这就是奥令波，来使馆与被软禁的情人相会。然而，好景不长，不久，这个小把戏就被夏多纽夫侯爵发现了。侯爵这回真的动了怒，他立即把伏尔泰打发回法国了。

在两人分别的最后一次约会中，伏尔泰告诉奥令

波，如果她能改信天主教，也许可以利用教会的力量使她摆脱母亲的管束，到法国和他相聚。奥令波同意这样做。于是，二人分别开始进行活动，伏尔泰求助于以前的老师、耶稣会教士杜尔纳米神甫，奥令波则请求她做主教的表叔戴弗尔给予帮助。他们的计划几乎有可能实现了。但这时，夏多纽夫侯爵出面干涉，担心会因此事而引起法国和荷兰之间的外交纠纷，影响两国关系。这样，他们的努力没能成功。

伏尔泰海牙之行的影响并没有到此结束。夏多纽夫侯爵给老阿鲁埃写了一封信，信中罗列了伏尔泰的种种荒唐的劣迹。老父亲这一气非同小可，老阿鲁埃也真是不幸，两个儿子都与他的希望相距甚远。大儿子阿尔芒越来越迷信让森教，虔诚苦修，简直不近人情；小儿子却又举止放荡，行为不轨，简直太近人情。“我的两个儿子都是疯子，一个是散文式的疯子，一个是诗歌式的疯子。”老阿鲁埃本来就对伏尔泰非常不满，这一次小儿子在海牙近乎疯狂的举止更使他火上浇油。在当时的法国，做父亲的要管教自己的儿子，可以请求政府给予一道国王签署的家庭敕令，可以禁锢或是驱逐儿子。老阿鲁埃得到了一道这样的敕令。伏尔泰躲起来，一边与父亲抗争、周旋，一边争取把自己的情人弄到法国。后来，奥令波到法国的计划没能成功，于是，伏尔泰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与父

亲讲和。老阿鲁埃对儿子毕竟是有感情的。他没有对伏尔泰行使政府授与他的权力，但条件是：他要继续学习法律，并且从事法律工作。伏尔泰答应了。

与奥令波分手的悲哀并没有影响伏尔泰多长的时间。毕竟他还很年轻，这段恋情在他的一生中只能算是段小小的插曲。随着时间的流逝，伏尔泰渐渐地把奥令波淡忘了，而奥令波也找到了新的爱情。

1714年初，伏尔泰在巴黎一个律师事务所做见习律师。他很讨厌律师事务所里的事务和气氛，没过多久就溜掉了。之后，他和以往那班圣殿集团的贵族朋友又恢复了密切的交往。尽管有了最近几年的经历，伏尔泰已成熟了不少，但他仍然很乐意与这班纨绔子弟在一起高谈阔论，讽刺挖苦，反对宗教。同时，他也没忘了自己心爱的戏剧。为使自己的作品在将来搬上舞台时能够更成功，他这时已开始笼络男女演员，培养与他们之间的良好友谊。其中有一位法兰西喜剧院的女演员，名叫勒库弗尔，是位相当著名、很有天赋而温柔可爱的姑娘。她曾做过伏尔泰一段时间的情妇，并且在她活着的岁月里，一直是伏尔泰的好朋友。1714年伏尔泰写了一首讽刺诗《反基东》，并把它题献给了勒库弗尔小姐。

这段时间，伏尔泰的生活很是自由散漫，让老阿鲁埃不能满意。父亲为了使儿子浪子回头，把他打发

到德·塞恩侯爵那里做秘书。这一惩罚对于伏尔泰，正是因祸得福。德·塞恩是一位经历丰富的政治家，在路易十四的宫廷里也有一席之地。他自夸对于著名的太阳王(路易十四)的公开或隐密的生活都了如指掌。伏尔泰并没有跟这位八旬老人学法律，而是着迷于听他讲述有关国王的历史掌故、国王慎重的和有失检点的事，并且在旁边将这些故事记录下来。他后来的两部成功的著作《亨利亚特》和《路易十四年代》，都是得益于在这一时期从老政治家那里得到的启发和帮助。离开这里后，他仍时常回来向老人讨教。

就在这个时期，法国发生了一件大事。“太阳王”路易十四去世了。路易十四的统治，对于法国的强盛确实起了不少作用，但在他执政后期的几次战争中，法国连连失利，国库虚空，民不聊生，再加上教派纷争、天灾人祸，人们对路易十四的统治早有怨言。因此，他的逝世没有引起任何人的哀悼，而且正相反，人人拍手称快。由于路易十五这时只有5岁，不能掌管朝政，路易十四在遗嘱中指定奥尔良公爵菲利普为摄政王。人们刚刚从老王的禁锢下解脱出来，以为自己获得了自由，攻击前朝政制和当朝摄政王的文字非常多。伏尔泰也写了这些东西。由于摄政王以前也常混迹于圣殿集团的纨绔子弟中，伏尔泰对他的情况相当了解。他写了两首小诗，讽刺摄政王，其中一首

暗示摄政王与自己的女儿德·贝利公爵夫人有乱伦行为。尽管奥尔良公爵摄政时期被一致公认为是法国长时期以来最宽容、开明的时期，但他仍未对伏尔泰开恩并加以容忍，而是把他流入到一个偏远的小镇。这一次又多亏了老阿鲁埃的活动，伏尔泰被改为流放到巴黎附近的苏里。苏里公爵是他在圣殿集团的朋友，因此伏尔泰在这次流放中过的非常舒适，并且他在这里找到了继奥令波之后的第二个情人——苏珊娜——卡特琳娜·德·莉佛尔。莉佛尔小姐喜爱演戏，这一点倒是与伏尔泰不谋而合。再加上她性情开朗，长相漂亮，使得伏尔泰对她产生了感情。1719年伏尔泰再次被流放到苏里时，两人感情更加深厚。但最后由于伏尔泰一个朋友的插足，二人最终分手了。

伏尔泰被获准回巴黎后，完全放弃了法律学习。老父拿他也无可奈何了。可是伏尔泰不仅不愿听从父亲的话修习法律，而且还不思悔改，继续写一些要惹恼朝廷的诗。最终，在一篇名为《在幼儿的统治下》的诗作中，他的讽刺的笔调揭露了宫廷的腐败和朝政的混乱，其中又涉及了那位摄政王的丑事，最后得出结论：“法国将要灭亡。”这下子摄政王可是龙颜大怒。他对伏尔泰说：“阿鲁埃先生，我打算让你看一件你从没见过的东西。”“是什么东西？”“巴士底狱。”这次对话不久后的一天早晨，伏尔泰还没有起床，就

有两个警察来到他的住处，把他和他的仆人客气地引进马车送到了巴士底狱。这样，年轻的伏尔泰第一次进入了巴士底狱，这一天是1917年5月17日。

在伏尔泰的生活中，有着许多矛盾的事情。的确，在他的一生中，始终充满着矛盾。而他的这一特性，在他年轻时就已得到充分的体现。由于在大路易中学时实行社会等级制度，不是贵族的伏尔泰对贵族及其特权一直怀恨在心，可是同时他又喜爱和贵族子弟交往，并以自己的母亲有贵族血统而感到骄傲；他憎恶耶稣会以及耶稣会给予他的教育，可同时他却又和不少的耶稣会教士私交笃厚，把他们看作良师益友；他反对宗教，可同时自己却又是一个天主教徒，并曾试图使自己的情人皈依天主教，以使她能到法国和自己相聚；他坚持自己的志向，不愿听从父亲的安排去学习法律，可他仍然几次屈服于父亲而去做违心的事。凡此种种，说明了伏尔泰既有出众的聪明才智，在他的生活中也有着和普通人一样的弱点。也许正因为如此，使得伏尔泰的整个人在后世看来更加扑朔迷离，无法掌握。在他整个的一生中，这种矛盾的情形一再地出现，这正是伏尔泰性格中最典型的特点。

三 巴士底狱

23岁的伏尔泰被投入了巴士底狱。巴士底狱不仅在法国，而且在全世界的历史上都有着重要的地位。这里原来是14世纪时建造的炮垒，后来被改为监狱，专门关押一些重要的政治犯和法国名人，不少人因思想、言论触怒统治者都被关在这里饱尝铁窗之苦。1789年7月14日，在法国大革命中，被革命党人摧毁。只因写了两首小诗就被关进大牢，这种刑罚可真不轻。其实，由于巴士底狱里关押的大都是一些有影响有地位的人士，他们仍能享受较好的待遇，可以带仆人同住，可以得到毛毯书籍、蜡烛、镜子等用具，伙食也不错，犯人也未必交伙食费，由国库支付。国王还免费赠送优质葡萄酒。白天，犯人可以自由活动，聊天、下棋、打牌等娱乐自便，还可享受取暖和洗衣服务。

虽然伏尔泰在狱中日子过的不错，可是像他那样活泼的青年，怎么能随随便便地打发长达11个月的牢狱生活呢？因此虽说他被禁锢在铁窗四壁之中，他的思想和文笔可没有因此而失去自由。其实，在他入狱之前，他就早已开始构思一部史诗《享利亚特》和

一部戏剧《俄狄浦斯》。在监狱里，生活舒适，环境安静，伏尔泰没有什么别的事好让他分心，他正好利用这段宁静的时光完成他的创作。再说他被关进牢里，心中满怀着对当政者的愤恨，这更能刺激他灵感的发挥呢。我们几乎可以想象的出，他在监牢里踱来踱去，一面思考着犀利的嘲讽，一面幻想着英国完善的法律以及被法律保护着的个人自由。对于这些自由，不久他就享受到了，同时也就认识的更深了。

1718年4月11日，在享受了11个月的优厚的监牢待遇之后，伏尔泰刑满释放了。摄政王在他出狱几天后接见了。这位奥尔良伯爵为了收买伏尔泰，使他不再用笔锋威胁自己的名声和地位，在宫廷里给予他奖励、年金和殷勤的招待。伏尔泰这时已开始认识到统治者和贵族们的险恶用心。他谢绝了摄政王：“殿下，请听伏尔泰说，您确实给了我在狱中很好的待遇，可我请求您不必再费心给我寻找住处。”

按当时的习惯做法，凡犯人从巴士底狱被释放出来，都必须接受短期的流放，流放期间不准返回巴黎。这样，伏尔泰一生中的第二次流放开始了。这一次他的选择仍如上次一样，是在他的朋友苏里公爵的领地苏里，住着朋友的大别墅，过着豪华的生活，并且和上次在这里流放时结交的女友莉佛尔继续恋爱。苏里乡间洁净的空气、自由的生活，以及快活的情人莉佛

尔的陪伴，使他真正过了一段幸福快乐的时光。

老阿鲁埃虽然对儿子一再违抗自己的意愿，并给自己带来这么多的麻烦而感到非常气恼，可是爱子情切，他终究不能摆脱对儿子的担忧和牵挂。于是，他四处求情，终于取得摄政王的同意，伏尔泰可以结束流放，返回巴黎了。

伏尔泰在巴士底狱中已完成了他的一部悲剧《俄狄浦斯》，只等回到巴黎就要上演。现在，他等待的时机到来了。

四 俄狄浦斯和亨利亚特

这时的法国正处于乱世时期。路易十四薨逝了，他统治下的巨大阴影和严峻的约束也消失了。人们刚刚获得自由，还不知道该怎样正确地行使这些自由，而只是喧嚷吵闹，为了一些并不值得如此的小事。不相信宗教的风气盛行一时，伤风败俗的事情随处可见。人人都逍遥地过自己的生活，热烈地嘲讽别人的事情，就连摄政王和自己的女儿德·贝利公爵夫人乱伦的故事，也到处被人议论和哄笑。人们想要发泄自己久已被压抑的情感。

这正是伏尔泰上演《俄狄浦斯》的好机会。这部悲剧并不是伏尔泰本人首先创作的，而是取材于古希腊作家索福克里斯的同名悲剧。但经过伏尔泰一改编，就具有了很强的时代感。这部悲剧的大意是：

底比斯国王斯拉伊俄斯和王后伊俄卡斯婚后多年没有后代。他们向阿波罗王祈求孩子，阿波罗王给了他们一道神谕：“你们将会有个儿子，但他日后将杀父娶母。”后来，儿子果真出生了。国王和王后想起神谕，非常害怕，为逃脱厄运，就把婴儿的两个脚踝刺穿，弃于山上。一个牧羊人非常同情这个婴儿，

就悄悄地把他送给了科林斯国王的牧羊人。这个牧羊人给婴儿起名“俄狄浦斯”，其意为“伤痛的脚”，并把他送给科林斯国王波吕波斯。

俄狄浦斯并不知道自己的身世，他在波吕波斯王的宫殿中长大，一直相信自己就是波吕波斯王的王子。科林斯国王的继位人。但是后来，一个嫉妒他的人告诉他说他不是国王的亲生儿子。于是第二天，俄狄浦斯离开王宫，去向阿波罗王请求神谕。阿波罗王给他的神谕是：“你将杀害你的父亲，娶你的母亲，并生下万恶的子孙。”他非常惊恐，为躲避厄运，离家出走。一天，他在路上遇到一位老人对他很蛮横，举棍打他，他便夺下棍子进行反击，一棍下来，老人当即倒地身亡。俄狄浦斯并不知道，自己打死的老人正是底比斯国王，他的亲生父亲拉伊俄斯。

就在这时，底比斯城外出现了一个狮身人面的怪物斯芬克斯。她要求过路人猜她的谜语，猜不中的人就要被她吃掉。人们都很害怕这个怪物，一时间底比斯城里人心惶惶。拉伊俄斯王的内弟克瑞翁贴出告示，谁能够除掉这个怪物，谁就继任底比斯的国王，并可娶王后伊俄卡斯为妻。俄狄浦斯看到告示，就揭榜前去挑战。斯芬克斯给他出的谜语是：“什么东西，早晨用四只脚走路，中午用两只脚走路，傍晚用三只脚走路？”聪明的俄狄浦斯立即猜出了答案：“这是人。

人的一生仿佛是一天，在生命的早晨，人非常弱小，无法站立走路，只好用双手双脚着地爬行；在生命的中午，人长大了，有了力量，就能只用双脚走路；而在生命的傍晚，人逐步走向衰弱，只好拄着拐杖行走。”斯芬克斯听到俄狄浦斯猜出了正确的答案，非常羞怒，跳崖而死。

俄狄浦斯除掉了可怕的怪物，成了底比斯城的英雄。克瑞翁谨守诺言，让俄狄浦斯做了国王，并让伊俄卡斯做了他的王后，两人生活的很幸福，并生了四个子女。

俄狄浦斯将底比斯治理的井井有条。他正直善良，治国有方，受到人民的崇敬和爱戴。忽然有一年，底比斯城内瘟疫流行。俄狄浦斯让克瑞翁去向神祈祷，带回来一宰谕：杀害前国王拉伊俄斯的凶手现在城内，因此天降灾祸于底比斯城。俄狄浦斯请来盲人预言家特瑞西阿斯，他说出的答案令俄狄斯震惊：“那个给底比斯城带来恶运的人正是你。是你杀死了拉伊俄斯国王，并和他的妻子一起生活。”

俄狄浦斯无法相信这是真的。他从伊俄卡斯那里了解了前国王遇害的经过，开始有点相信了。随后，科林斯城来了一位使者，说波吕波斯国王已经去世，请俄狄浦斯继位。这位使者正是当年把俄狄浦斯送给科林斯国王的牧羊人，而正巧随拉伊俄斯国王外出并

目睹先王被杀的仆人正是当初因怜悯俄狄浦斯而把他送给那位牧羊人的人。终于，一切事实证实了，尽管俄狄浦斯的亲生父母和俄狄浦斯本人千方百计地摆脱厄运的捉弄，他们仍然没有战胜命运的预先安排。俄狄浦斯羞愧交加、悲痛万分，回到寝宫，发现王后伊俄卡斯已吊死在床上。俄狄浦斯随即刺瞎自己的双眼，把底比斯城和孩子们交给克瑞翁，独自一人离国出走了。

《俄狄浦斯》原是古希腊流传下来的一个故事，多少年来被许多的剧作家改写。但伏尔泰这次的改写，与以往他人所做的不同。他在剧本中借剧情和人物的表演，表达了他自己的思想和对政治的各种观点，并且也改变了一些剧情和人物特点。这样，剧本就有了很强的时代感。在他笔下，俄狄浦斯的形象充满了悲剧色彩。他勇敢正直，聪明智慧，虽然尽力避免预言的实现，但终于没能阻止命运的应验和惩罚。伏尔泰借俄狄浦斯的口喊道：“残酷的神啊，我的罪恶都是你们造成的，你们却因为这些罪恶而惩罚我！”

这出悲剧在巴黎公演后，受到极大的欢迎，接连演出45场，场场暴满，这是伏尔泰创下的记录。观众看完戏剧后，都认为俄狄浦斯是值得同情的，一切罪孽都是由神造成的，神才是应当憎恶的。这在当时反宗教的社会气氛中，正是容易被人们接受的。他的

老父亲尽管一直反对儿子从事戏剧，这时也悄悄地来到剧场，观看儿子的戏剧，并且被深深地感动了。摄政王奥尔良公爵也带着女儿前来观看。伏尔泰把这部戏剧题献给摄政王，因此而得到了一笔年金和一枚奖章。

24岁的伏尔泰已经成功了，他的心中充满了自信，他的名字“伏尔泰”也是这时才开始用的。在发表剧本《俄狄浦斯》时，他从自己的原名中抽取了几个字母，组成“伏尔泰”的名字，并把它做为自己后来一直使用的名字。后来“伏尔泰”的名字响彻欧洲，并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他的原名阿鲁埃却被人们淡忘了。

与《俄狄浦斯》同时，伏尔泰也在进行一首长诗的创作，这就是《亨利亚特》。这首长诗的创作过程颇费周折。

伏尔泰梦想做一位伟大的史诗作家，使史诗这种体裁在当代也能为人们所喜爱和接受。他从20岁起就开始构思长篇史诗《亨利亚特》。圣·塞思侯爵了解很多有关亨利四世时代的掌故，伏尔泰听着他的讲述，内心对这位统一法国、平息叛乱的伟大国王非常景仰。尤其是亨利四世实施宗教宽容政策，发布特敕令，使新教徒得到信仰自由。这一切正是伏尔泰所推崇，而为统治者反对的措施。伏尔泰被关进巴士底狱

时，心中正充满对统治者的愤恨，需要用文字表达出来，利用《亨利亚特》正好得到借古讽今的效果。因此，伏尔泰在坐监时就开始写作这部长诗，其中开首的一些歌词与借题发挥讽刺当政者的几段，就是在这时写的。

在创作这部史诗的过程中，摄政王疑心伏尔泰又在写作不利于自己的诗，因此再次将他流放到苏里。这次流放期间，他为莉佛尔小姐写了剧本《阿德米斯》，还写了悲剧《玛丽安娜》，但都未获成功。在苏里，以及在他游历其他地方的时候，他一直没停止《亨利亚特》的写作。

《亨利亚特》的出版受到欢迎，但因为史诗这种形式早已过时，尽管伏尔泰对它下了很大的功夫，赋予它很多丰富的内容，仍未能使它成为一篇传世的佳作。除此之外，这部史诗尽管名噪一时，引起不少的反响，却没得到官方的出版许可。由于它主张宗教宽容，反对宗教狂热和迫害，没有偏向于天主教和新教任何一方，反而使得两个教派都认为他倾向于对方。

在伏尔泰创作这部史诗期间，他的老父亲于1722年初病故了。小儿子从小就不听从父亲的管教，长大后也给父亲带来了不少麻烦。但尽管如此，父亲仍然是爱儿子的。尤其是在观看演出《俄狄浦斯》之后，父亲已承认儿子在戏剧上的天赋而原谅了儿子以

前的种种不端的行为。伏尔泰和哥哥阿尔芒参加了父亲的葬礼。摄政王为了笼络伏尔泰，也为表彰老阿鲁埃对国王的服务，赐给伏尔泰一笔2000法郎的年金。

这些年里伏尔泰好运不断。戏剧和文学上的成功使他名声大涨，而同时在金钱上，他也连连有所收获。父亲留下的遗产以及摄政王给他的年金，已使他比较富有。而他又认识两位精明的银行家巴利斯兄弟。在他们的帮助下，伏尔泰利用自己的法律知识和经济头脑，将自己的财产用于投资，在不长的时间里就获得了大量的财富。既有天才又有金钱，伏尔泰有点志满意得了。

他的才华和富有使他能够和所谓上流社会的贵族们来往，同时也给他带来了美女和爱情。他的情人，除了莉佛尔小姐和勒库弗勒小姐外，还有贝尔尼埃侯爵夫人、鲁佩尔孟德夫人和普利埃侯爵夫人等。摄政王死后，路易十五亲政，新王后也很赏识伏尔泰的戏剧。奢侈的生活，浪漫的爱情，成功的荣誉，这一切使伏尔泰有点飘飘然了。他就这样度过了几年毫无成就的日子。后来发生了一件事，这件事使他的生活完全改变了。

1725年12月的一天，伏尔泰和女友勒库弗勒在歌剧院的包厢里，遇到了洛昂·夏鲍骑士。洛昂

骑士的家族是法国最有权势的家族之一。他很妒嫉伏尔泰在社会上取得的荣耀，并且也正在追求勒库弗勒小姐。他走过来傲慢地问道：“先生，你的姓氏到底是什么？是伏尔泰，还是阿鲁埃？”伏尔泰回敬道：“骑士先生，我没有显赫的姓氏，但我却使我的姓氏显赫起来。”洛昂骑士恼怒地走了。

伏尔泰以为这件事就此结束了。可是过了几天，伏尔泰在苏里公爵家中吃饭时，进来一个仆人说有人等在门外要和伏尔泰相见。他毫不在意地出去了。谁知，门口的马车上的两个人突然抓住他，用棍子将他痛打了一通。洛昂骑士坐在车前说道：“别打他的头，那里会制造出一些好东西的。”围观的人们都叫道：“真是个好心的老爷。”伏尔泰狼狈地回到屋里，苏里公爵和朋友拒绝陪他去警察署，还一起哄笑他。

这一次的遭遇真的惹怒了伏尔泰。他想好好报复一下这位胆敢冒犯他的洛昂骑士。他请了一位武术教师教他击剑，预备学好后和洛昂骑士决斗。洛昂骑士却非常害怕，向警察署报了案。警察局长恰好是他的表弟，事情就好办多了。伏尔泰于1726年3月28日第二次蹲进了巴士底狱。不过这一次国王倒没免费招待他多长时间。他在牢里向把他送进监狱的国务大臣莫勒伯请求允准他离开法国去英格兰。兴许莫勒伯大臣也觉得对他的刑罚过重，立即就答应了。于是，

他不久就到了英格兰。

这件事的发生是偶然的，然而其结果对于伏尔泰来说却极为重要。是它把伏尔泰从纸醉金迷，毫无建树的生活中解救出来；是它使他开始看清了贵族“朋友”们的伪善嘴脸；是它使他真正开始运用自己的才能；而最要紧的，是它使得他真正看清政府的面目，并走上永远反对政府的道路。

五 流亡英格兰

伏尔泰到英国时，看到的一切都是使他感到美好和振奋。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早已结束，君主立宪政体已经确立，与欧洲大陆的君主制国家相比，政治上的民主和自由气氛要浓重的多。伏尔泰刚刚从一个立制的国家被放逐，在英国这样一个较自由的国度里，呼吸顿感畅快了许多。并且英国的宗教气氛比较淡薄，宗教狂热和宗教迫害的事都很少发生，这正合伏尔泰的口味。

起初伏尔泰来到英国，是想先投靠他的朋友鲍林勃洛克爵士，可是在伦敦没能碰到他。这样，伏尔泰就接受一位叫法格纳的商人的招待，住到了商人的一座乡间别墅里。这位商人对待伏尔泰非常真诚和慷慨。伏尔泰也出身资产阶级，和商人属同一社会阶层，再加上两个人彼此真诚，因此他们挺谈得来。伏尔泰在这里住了很长时间，1733年他还把自己创作的悲剧《查伊尔》题献给了法格纳。这在当时确实应该算是相当大胆的了：题献悲剧给一位商人！从他这一大胆的举动，我们也可以看出他对贵族和平民的看法确实是变了。

同时，伏尔泰在英国的文学界、政界，甚至宫廷也都得到了很好的招待。与他来往较多的文学家，主要有英国杰出的诗人蒲伯、著名作家斯威夫特、剧作家康格里夫，以及诗人汤姆森、剧作家盖伊等。他对蒲伯、斯威夫特的评价相当高，称蒲伯是英国最杰出的诗人，并在后来出版的《哲学通讯》中评价他：“是英国的最漂亮、最正确，尤其是最和谐的诗人。”斯威夫特也是伏尔泰的好朋友，是著名的长篇讽刺小说《格列佛游记》的作者。伏尔泰给予这篇小说很高的评价。而他和康格里夫的会见却并很不愉快。康格里夫不愿伏尔泰称他诗人，而要求伏尔泰把他作为一个普通的绅士来交往。伏尔泰说：“如果你只是位普通的绅士，我就不来拜访你了。”伏尔泰对这位自恃高大的剧作家十分不满，认为他不尊重自己从事的文学职业。但他对康格里夫的作品仍然给予了较高的评价。

伏尔泰是第一个把莎士比亚和牛顿这样两个英国伟大的人物介绍到法国的人。在此之前，法国人并不了解他们。伏尔泰在学会熟练地使用英语后，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掌握了除莎士比亚外的全部英国文学。伏尔泰这个爱讽刺的法国哲学家不能理解英国最好的心灵，正如严肃的英国哲学家不能理解法国最好的心灵一样。伏尔泰把莎士比亚比作野蛮人，一个多世纪

后，英国哲学家卡莱尔报复地把伏尔泰称为疯子。伏尔泰觉得莎士比亚缺乏高尚的趣味，也不懂戏剧艺术的规律。但是，尽管有这些不满的地方，他仍然认为，莎士比亚创造性地发展了戏剧。他把莎士比亚剧本中的个别场面译成法文，借用它的一些情节，或者利用戏剧冲突，模仿着他来写剧本。在他之前法国人对莎士比亚是如此陌生，当伏尔泰把他翻译的莎士比亚的著名悲剧《朱利叶·恺撒》寄到法国科学院时，达兰贝尔在1762年正式答复中说：“科学院没有原文剧本，因而无法评判这篇翻译的优劣。”

法国人了解牛顿，也是从伏尔泰这儿开始的。当伏尔泰在英国时，他潜心钻研牛顿的理论著作，对牛顿在物理学上的突出贡献非常敬佩。当时法国人还不了解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和光学原理。这些自然科学方面的伟大成就十分深奥，一般人不易理解，伏尔泰用他简洁明了的语言和深入浅出的手法，向法国人介绍牛顿的学说。从这时候起，牛顿的名字才为法国社会所知晓。

在英国，伟大的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等受到人们和社会的高度尊敬，这一点使伏尔泰大加赞扬。他一直主张，文学上的才能比高贵的出身更重要，更应当受到尊敬，可是在法国，像他这样出色的人竟会两次三番被投进巴士底狱，并且遭到贵人的棒打。比

较之下，更使伏尔泰大加感慨。尤其是看到牛顿去世时，国家为他举行的宏大的葬礼更使他惊异于英国对于这样的科学天才所表示的敬意。牛顿的遗体在火炬通明的寝床上被抬到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后面跟着大队的送葬人群，包括首相和大臣。伏尔泰说：“牛顿先生在世时受到人们的尊崇，死后也得到了他应当得到的荣誉。”

可是后来，当热情过后，伏尔泰能把这一切看的更清的时候，他又推翻了以前的说法：“我年轻时以为牛顿的幸运是由他伟大的功业而得的，朝廷与人民是为表彰他而才授予他勋位，谁知全不是这样，牛顿有一个可爱的侄女，叫康特伊特夫人。财政大臣哈利法克斯很疼她，如果没有一个美丽的侄女，什么微积分，什么地心引力，都不值一文的……”这段话虽说有些偏颇，在当时的英国其实倒也是现实。

伏尔泰在英国还目睹了著名女演员奥尔菲尔德小姐的葬礼。这位小姐得到和牛顿一样的礼仪，被葬于西敏寺。后来伏尔泰回法国后，他以前的情人、著名女演员勒库弗勒小姐被情敌毒死后，教会竟不准把她葬在教徒墓地上，部分是由于没有做死前的宗教仪式，但更主要的她是演员，法国人认为演员的职业很下贱。于是，人们只能把她葬到塞纳河畔的一片荒地上。比较之下，令伏尔泰非常愤慨。他写了一首名为《勒库

弗勒小姐之死》的颂诗鞭挞了天主教会这种卑劣行径，这首诗至今仍是愤怒揭露教会的恶习与热烈颂扬启蒙思想相结合的优秀政治抒情诗的典范。在颂诗中，伏尔泰激愤地写道：“在古希腊可以给她设立祭坛／在法国却不给她安葬。”“要是勒库弗勒生在伦敦／一定也会／在哲人贤士英雄明主旁有她的墓坟。”

为死去的女演员作颂诗，这种行为是被认为大不敬的。伏尔泰又一次得罪了天主教会。这时他只好逃到了诺曼底去。

伏尔泰在英国期间，还写了一部历史著作《查理十二史》。查理十二是瑞典的国王，他的生平事迹早已引起伏尔泰的兴趣。这时，伏尔泰在英国又遇到了曾跟随在查理十二身边的法勒里斯，和他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详细了解了查理十二的性格、轶闻和几次战役的经过。此外他还见到了其他一些了解查理十二的人。这些都对他的创作有不小的帮助。伏尔泰的历史观在史学上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主张史书应当更着重于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而不应只注重战争和外交。伏尔泰的历史观被认为是启蒙主义历史学，这是和十七世纪的人文主义历史学相对的。

六 哲学通信

伏尔泰在流亡英国的3年中，创作了不少作品，其中包括史书《查理十二史》、悲剧《布鲁图斯》、哲理小说《小大人》等。但其中最重要的、影响最大的一部著作，无疑只能是这部《哲学通信》。

《哲学通信》是伏尔泰的第一部哲学著作。是他将自己在英国的所见所闻以及自己的感想用书信的体裁写成的一部哲学通信。全书由25封信组成。专家们认为这本书是“18世纪法国思想界接受英国影响的滥觞”。伏尔泰对英国的信仰自由和政治自由十分欣赏，并在书中大力抨击了法国的封建专制制度、宗教道德和科学体系。

前五封信是有关宗教派别的信。每一封是关于一个教派：朋友会、长老会、唯一会、英国教会、阿利安会。伏尔泰一向关心宗教问题，反对宗教专制、狂热。在这五封信中，他对每一种教派的缺陷和各教派之间的分歧、纷争都作了明确而尖刻的分析和说明，并且利用书中的人物，来表达自己的有危险性的主张。其中有一段这样的对话：“亲爱的先生，你有没有受过洗礼？”他问。朋友会派的人说：“不，而且我的

同伴也绝对不受洗礼。”他答道：“什么？真该死。难道你们不是基督徒？”“朋友，不要发誓。我们的确是基督徒，但我们不信基督教义在于洒些盐和水在头上。”“唉！上帝，我被他这种不敬的态度气坏了。难道你忘记了耶稣基督是由圣·约翰给他施洗礼的吗？”“朋友，基督受着约翰的洗礼，但从未为别人施洗礼。我们是基督的信徒，可不是约翰的信徒啊。”“啊，你真该被异教裁判所放的火活活焚死。”伏尔泰的笔真是尖利无比。他用他惯用的讽刺的方法，大大地讥讽了各个教派一番。

紧接着宗教问题之后的是关于政治问题的通信。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资产阶级的地位和力量都比以前大为增强。下议院的势力比上议院还大，很多贵族的特权遭到废止。伏尔泰对这样的革命当然是欢迎的。他在两封信中谈到英国议会和政府问题，就表达了他对此的看法：“这些情形使一个英国商人敢自傲，也敢于与罗马公民相比。所以即使是贵族子弟也不看轻经商的。”

第三部分是比较通俗化的书信。他在一封讲述洛克的哲学的信中，借机表达了自己的信仰。这是伏尔泰第一次将它表达出来，那就是一自然神论。伏尔泰反宗教，但并不反对上帝的存在。正相反，伏尔泰相信上帝是存在的，世界就是由上帝创造的，但上帝一

旦创造出世界之后，就不再干预世界的事务。至于上帝是什么样的，我们谁也不知道，而且也未必就能知道。伏尔泰还相信灵魂不死，但在自然中他又找不到灵魂不死的痕迹。因此他赞美洛克的说法：“一件纯粹物质的本体到底有没有思想，也许我们永远不能知道。”

后面的几封信内容较多而且杂，有关于牛顿、地心引力、光学等等的内容。这些书信表现出，伏尔泰有着很强的好奇心，并且涉猎面宽，知识广博。但是这部分内容比较正统，属于纯科学的领域，不会给伏尔泰带来什么麻烦。

《哲学通信》的最后一部分是关于戏剧的书信，有喜剧也有悲剧。其中一封谈及他对莎士比亚的看法：“他在英国人的心目中地位无比高尚，天赋高超，才华横溢，其戏剧自然流畅，没有矫揉造作的感觉，极为崇高壮丽。但谈到典雅的笔风、严谨的规律，他却一无所知。”这段话确实很简洁真实地表达了他的见解。他一方面认为莎士比亚的戏剧不够典雅，不讲求戏剧创作的规律，一方面却又认为莎士比亚是位戏剧天才，其作品远非平庸之作。因此他反对法国人对莎士比亚只进行单纯的批评，而主张应认同并吸收他的戏剧中卓越的地方。伏尔泰还亲自翻译了一些莎士比亚的作品，如《朱利叶·恺撒》，以及《哈姆莱特》

中最精采的片断“to BE or not to”，把这段独白译成了法文诗。尽管他的译文并不完全忠实于莎士比亚的原作，但他的诠释倒是有些深意：“迄今为止，英国的诗歌天才有如一株大自然种植的丛树，它随便长出许多纵横的枝干，尽力地生长，可决不是平均的发展。要是你拂逆它的本性，硬要把它修剪的跟花园中的树木一样，那它一定会枯死的。”这段注释，其实就是主张艺术的发展应当顺其自然而不是强制一样，否则就会扼杀艺术的生命力，限制文学家和艺术家们天才的发挥。其实伏尔泰的这个态度，对于当今我们的时代，又何尝不是很有益的呢？

《哲学通信》的创作，本来并不是为了出版，而只是私人之间的书信交流，但是一个不讲信义的书商没有经过他的同意就在法国发行了。这给他招来了意想不到的麻烦。他早就担心会造成这样的结果而不愿将这本书出版，但谁料会有这样勇敢的出版商就悄悄把它出版了呢？政府认为这本书充满了爆炸性的反政府宣传：“这是一只满载火药的游艇，足以构成社会安全的重大危机。”法院将这本书列为禁书，“堆在王宫前面大石梯下焚毁，因为它违反宗教，妨害善良风俗，不敬权威。”这条禁令于1734年6月10日被执行。勇敢的出版商被投进了巴士底狱，伏尔泰也遭到通缉。他可不愿到巴士底狱去故地重游，这时他

得到幸运之神的眷顾，躲到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情人——夏德莱侯爵夫人的、不受法国管辖的西雷庄园去了。

《哲学通信》是伏尔泰影响最大的一部著作，不仅是他旅英期间的所见所闻及内心体会，同时也是他多年来在政治、哲学、文学、宗教等方面思考的结果。有人说，它的出版标志着伏尔泰的思想和哲学思想的成熟，也标志着声势浩大的启蒙思想的运动正式开始。这种说法无疑是有根据的。

七 西雷岁月

夏德莱侯爵夫人是当时有名的才女，精通物理、数学、天文学，懂英文、意大利文和拉丁文，翻译过牛顿的著作，非常崇敬伏尔泰的人品和学识。她父亲原是伏尔泰的好友，因此，她从小就认识了伏尔泰。20岁时，她嫁给了夏德莱侯爵。七年的婚姻生活中，她为侯爵生下了三个儿女，在当时的法国的风气，这样就已经可以说是履行了婚姻的责任，她可以在婚姻之外享受自己的幸福了。恰在这时，夏德莱侯爵统兵边地，离开了他的领地，给伏尔泰留下了可乘之机。爱米莉对伏尔泰非常爱慕，央求皮埃尔公爵夫人带她去见伏尔泰。第一次见面，爱米莉就对伏尔泰表示的非常亲热。伏尔泰这时刚从英国回来不多久，满心里装的都是牛顿和洛克的名字和理论。可是当时的法国，没有什么人能 and 伏尔泰交流这些思想。于是，突然出现的爱米莉，带着热情可爱的笑容和满肚子的科学爱好，向他表示倾慕，伏尔泰在感情方面可不是个傻瓜弱智，他立刻向爱米莉作出响应，两人一拍即合，从此成为15年的亲密情侣，直至爱米莉去世。

当《哲学通信》的出版给伏尔泰带来麻烦时，夏

德莱侯爵夫人(即爱米莉)邀请他到夏德莱侯爵所有的一座庄园里去避难。这座西雷庄园位于法国东北部，与比利时的边界相距不远，有个什么风吹草动时很容易溜走。伏尔泰很喜欢这个地方，当然接受了，并且拿出大把钞票对这座别墅进行装修。至于夏德莱侯爵，并不是很富有，也不怎么关注这座庄园，至于说到爱米莉和伏尔泰的恋情，他可是一点也不在乎。他非常豁达大度、通情达理，同意爱米莉在他之外的男人那里寻找幸福，也同意把西雷别墅供给两人使用。此后，夏德侯爵先生还不时地来到西雷，看望伏尔泰和爱米莉以及自己的孩子。甚至当爱米莉以为伏尔泰移情别恋而伤心落泪，打算离开伏尔泰时，侯爵先生还劝她不要感情用事，要考虑到伏尔泰的前途。爱米莉后来曾对别人说：“如果我不说他是最好的丈夫，那么我就是最坏的妻子。”从这件事中，我们可以窥见当时法国社会的自由放荡的风气，越是上流社会的人，个人生活越是随便糜烂。当然我们并不是指责伏尔泰和爱米莉，而是就当时整个法国的情况而言。其实，伏尔泰和爱米莉的感情是相当真诚而持久的，否则它不会持续那么长时间，在出现种种矛盾之后仍能保持下去。“一个女人要是爱了一个名人，她的私情可以永垂不朽”。如果没有伏尔泰以及与伏尔泰的爱情，现在有谁还会记得夏德莱侯爵夫人呢？

伏尔泰和爱米莉在西雷的共同生活，是充实、幸福而有趣的。两个人非常相爱，可是两个人除了爱对方外还各自爱着许多其他的东西。他们的朋友很多，西雷庄园常常暂居着不少朋友，可是在工作时间他们从不陪伴宾客，而是在自己的工作室里埋头苦干。每天饭后，他们都各自钻进自己的工作室，有时彼此除了吃饭时间外几乎见不到面。但他们对朋友也是很热情的。每天午饭后的半个小时，伏尔泰会邀请他的客人们在书房的门廊里随意交谈，天南地北，无论谈什么，伏尔泰都是谈笑风生，只除了两个人：让·巴蒂斯特·卢梭和台丰丹纳神甫。只要一谈起这两个人，伏尔泰就会失去节制地诅咒谩骂。这是不无原因的。在1722年伏尔泰去荷兰旅行时，途经布鲁塞尔。他在旅途中给同行的鲁佩尔孟德夫人写了一首哲理诗《致乌拉尼诗简》，他在诗中初步阐发了他的自然神论的基本思想。在布鲁塞尔，伏尔泰会见了多年不见的让·雅克·卢梭。这位诗人对《亨利亚特》给予好评，对《致乌拉尼诗简》却提出强烈批评。从此以后，两位诗人的关系彻底破裂，甚至彼此带有仇恨的情绪。而台丰丹纳神甫，则是一个十足的小人。他们二人于1724年相识，伏尔泰已经知道此人不地道。在1723年夏天，神甫秘密出版了一个《亨利亚特》的伪版，加上了自己的一些描写，其中有些色情的场

面。当时伏尔泰并没表示自己的不满，只是尽力阻止了伪版的流行。1724年底，神甫因被控鸡奸罪被判死刑投入地牢。他要求伏尔泰帮忙，伏尔泰向警察总监、自己的好友达让松侯爵求情，台丰丹纳神甫才免于一死，改判为流放，尔后又由于伏尔泰的疏通，他不久就重获自由。但台丰丹纳神甫是个如此忘恩负义的小人，他后来专门与伏尔泰为敌，不放过任何机会攻击恩人。伏尔泰写过一首诗《忘恩负义》，揭露了这个小人的丑恶嘴脸。因此，我们不难理解，伏尔泰这样一个爱憎分明的人，绝不能容忍这样的人物。

和客人们门廊里的交谈时间是确定的，半个小时。时间一到，伏尔泰就向客人们鞠躬致歉，随后进入工作室。他回到书房工作，直到晚上九点吃晚饭的时候才出来。客人们都是伏尔泰的朋友，不会因为主人这样的招待不周而气恼，而是会自己在庄园里或附近寻找消遣。晚饭时，伏尔泰会使出自己的拿手好戏，使西雷的晚宴成为最令人开心而无法忘怀的晚宴。他用最好的葡萄酒招待客人，把他最有趣味的剧本内容讲给他们听，以他讽刺的哲理小说博得他们的阵阵笑声。他的幽默的确是超凡出众的。

伏尔泰和爱米莉虽说是相爱的情侣，却同时也是个性非常鲜明的人。所以两个人也常常会产生矛盾。葛拉斐民夫人的通信中曾谈及这对奇怪的情侣的私生

活：“夫人是专制的，伏尔泰是爱反抗的。比如说穿衣服吧，她要他更换，他推说要着凉，她坚持着。于是两人在言语之中就生气了。伏尔泰走了，叫仆人进来通知说他腹痛。这便是他们古怪的把戏。”两个人经常为这样的小事争吵，很快又重归于好，用英语彼此讲些慰藉的温柔话，他们用这样的方法来寻开心。一天晚餐时，伏尔泰本来答应给大家朗诵一首诗，因为爱米莉不准他喝一杯葡萄酒，一气之下，拒绝履行许下的诺言，爱米莉也板着脸。后来，在大家的劝说下，伏尔泰还是朗诵了他的诗。那顿晚餐的余下时间里，大家都过的很惬意。爱米莉作为巴黎上流社会中的名媛，很喜爱在巴黎的生活，并不愿意去西雷。但出于对情人的爱，她还是跟着伏尔泰到西雷。他们两人像夫妻一样生活在一起，白天他们分别到自己的房间，一个写诗作文，一个演算几何；一个潜心于自己的文章，一个则专心致志地做实验。两人的爱情几乎是柏拉图式的，但他们都很乐意保持这种哲学式的恋爱。在西雷和他们一起生活的有爱米莉的儿女，以及孩子们的家庭教师神甫。夏德莱侯爵有时也到西雷来小住。当两位男女“主人”各自去工作时，侯爵先生就和自己的孩子一起玩耍，消磨时光。爱米莉不仅是一个专制的主妇，还是一个好嫉妒的情人。有一段时间，西雷住着两位夫人，尚鲍南夫人和葛拉斐尼夫

人。爱米莉对伏尔泰很不放心，就插一个仆人在伏尔泰身边，为她做眼线。这样，只要伏尔泰的房间里有女人在，爱米莉立刻就会知道。有一次，伏尔泰请葛拉斐尼夫人到自己的房间，给她朗诵自己所写的诗。就在这时，爱米莉出现在门口，脸上带着嫉妒的神情对葛拉斐尼夫人说：“太太，如果你同意的话，我想单独和先生说几句话。”爱米莉的担心不是多余的。伏尔泰一向是一个多情风流的人。在爱米莉之前就有过不少的情人，而且女人们因为他的名声和才学，也都愿意和他交往。因此，即使这次他对爱米莉是动了真正的感情，也不能使他就此结束他的风流生活。伏尔泰与尚鲍南夫人的关系已经有四五年的历史了，葛拉斐尼夫人到西雷后不久，也成了伏尔泰的情人。

伏尔泰本人就是一个剧作家，自然十分喜爱戏剧。他第一次去海牙时就会抱怨说在那里不能经常看到好的戏剧。在巴黎时，他几乎三天两头就要去一趟法兰西喜剧院看戏，并交了一些演员朋友。现在，在西雷这个地方，他差不多根本无法看到戏剧。他为了满足自己的愿望，只好自己组织了一个业余剧团。他雇来工人把阁楼改建成小剧场，欢迎西雷镇的所有居民都来参加。尚鲍南夫人自然是不缺席的，就连临时来的客人有时也被指派演一个小角色。爱米莉的小女儿作小演员，夏德莱侯爵先生来的时候，也被要求上台表

演。他笨拙的姿态常常引起人们的哄堂大笑。西雷美妙而宁静的生活也时常被一些小插曲打断。18世纪，在法国人们对尚古主义的争论比较大，其实无外乎两大类：赞成与反对。而赞成者也分为两类：文化尚古主义和生活尚古主义。前者认为古代社会的文化道德要优于文明社会，后者则认为现代社会的生活水平不及古代社会。让·雅克·卢梭是前者的代表。

这时，伏尔泰为表示反对尚古主义，写了一首哲理诗《摩登人物》。在这首诗中，伏尔泰用他讽刺而幽默的笔锋，嘲笑了远古时代人们过的一无所有的生活，原始人没有私有财产的观念是因为他们一无所有；教会所鼓吹的纯洁的爱其实不过是兽欲；那时的人们过着简朴的生活，只是因为无知和蒙昧。伏尔泰利用这首诗为他们当今的奢侈生活辩护，并直言自己喜欢过奢侈的生活：“人间乐园是我生活的地方。”有人评论说：《摩登时代》是“为爱享受的人，为快活、享乐、风雅和幸福的人辩护，是一首巴黎生活的颂歌”。

鉴于以往的经验，伏尔泰知道他这首诗必定会给他招致不小的麻烦。因此他比往常更加谨慎地保存这部手稿，只把几部副本送给少数几个他认为可信赖的朋友，叮嘱他们不要向外流传。但是伏尔泰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他的朋友、吕松主教德比西伯爵突然得暴病死亡，在他的遗物中人们发现了这首哲理诗。这引

起了当局的注意。伏尔泰在诗中暗示亚当从未修剪过胡子，指甲太长，还享受着与夏娃的肉体关系。这些被教会认为是大逆不道的。

1736年12月22日，身在西雷的伏尔泰和爱米莉收到伏尔泰的好友舍利厄公爵夫妇的一封告急信，向伏尔泰传达了当局对《摩登人物》的不满。伏尔泰和夏德莱侯爵商量后，决定先出国去避一避。爱米莉把他送过法比边界。这一回西雷庄园的妙处显露出来了，他很轻易地逃离了法国。但是在这样寒冷的季节，出外旅行并不是一件伏尔泰所为之辩护的奢侈生活。爱米莉很担心寒冷的气候会使他的身体变坏。伏尔泰经过比利时到达了荷兰，这里是他初恋的地方。当他的《哲学通信》在法国被列为禁书时，却在荷兰被公开出版发行，并受到赞赏，轰动欧洲，一年之间连续再版十次。由此可见，荷兰的政治气氛和宗教气氛要比法国宽松的多。这一次伏尔泰来到荷兰，受到了最热情的欢迎，王室成员、政界要人、文化名人、学术界人士以及出版商，都来拜访他。他忘记了初逃法国的烦恼，在海牙努力地工作，修改自己以前的著作。

在这同时，他的法国朋友们正在四处活动，以使他能早日返回西雷。夏德莱侯爵不断给国务秘书弗勒里红衣主教写信，里舍利厄公爵也在巴黎上下疏通。

幸亏这个案子又是伏尔泰的老同学、警察总监埃罗主办。1737年3月伏尔泰又回到西雷庄园，重过起了世外桃源般的幸福生活。

爱米莉对自然科学的爱好，逐渐影响了伏尔泰。本来在英国时，伏尔泰对牛顿的科学贡献就已很有兴趣，现在在爱米莉的影响下，他更潜心于钻研牛顿的物理学和自然哲学。他的朋友们都不理解，不支持他这样做，可是伏尔泰仍固执地进行自己的研究上并着撰写《牛顿哲学原理》。当时，除了英国以外，很少有人能理解牛顿深奥难懂的科学成就。伏尔泰尝试着把牛顿的科学原理通俗化，使普通知识水平的人都能看懂。伏尔泰一生中的重要成就，都是在文学、艺术、历史方面，他对于科学其实并无突出的天赋和恒久的热情，但这次的工作却使他感到兴趣，并且确实是一件有益的工作。他把牛顿介绍给了法国人，并且他自己也从中得到益处。对科学的研究对他后来的文学创作和哲学著作都有很大帮助。

然而伏尔泰在研究牛顿的科学的同时，并没有放弃在其他方面的创作。他热爱历史，他的长篇史诗《亨利亚利》以及史书《查理十二史》都是他在历史方面的兴趣结成的硕果。而今，在西雷，他又在着手作一部史书《路易十四时代》。伏尔泰在流亡英国时，就已经在准备写这部历史方面的著作，如今在西雷的

宁静岁月，正适于写作这样的书。并且在这段逍遥的时光中，他对很多问题进行了思考，形成了一些自己的政治观点，他把这些观点在《路易十四时代》中表达出来。他认为，一个国家要强大，必须使人民享有建立在法律基础之上的自由，或者使最高权利巩固强化，无人非议。虽然伏尔泰对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度给人民和社会带来的自由宽松的社会政治气氛很是赞赏，但他认为这种政治制度并不适合于法国。法国极其久远的君主制使得人民已习惯服从君王，此外，英国的宗教势力并不强大，不会形成教会对政治的干预控制，而在法国，教会的势力如此强大，几乎危及宫廷的统治，并且法国的贵族干预政治的情况也十会严重。伏尔泰在这些问题上的思考，在以前创作史书时还未成熟，因此没有明确的表达。而这次在《路易十四时代》中，他的王权主义思想表达出来了。他在研究历史的过程中看到，教会和贵族一次次在把法国推向混乱的深渊。因此，他主张法国实行君主制，国王拥有最高权力，可以排斥教会和贵族的参政。伏尔泰在提出这种主张时，也意识到了“这种最高权力可以被滥用，因此是危险的，不过分散的权力会更危险”。这确是法国的真实情况。伏尔泰深信，如果君主深明哲理，对社会进行必要的改革，那对人民将是十分幸运的。他对国王寄予很高的希望。他后来曾对人说过：“当

君主是一个哲学家时，那将是人类的最大幸福。”“仁慈的国王是上天所能给予大地的最好的礼物。”为此，他曾试图与路易十五保持良好关系，希望在法国实现自己的理想。可是现实使他的幻想一次次地破灭了。除《路易十四时代》外，伏尔泰在西雷还写了另外一部历史著作《风俗论》。这是一部世界史式的史书，它谈到阿拉伯的文化、中国文化，并且对各种宗教制度进行了比较。这在当时的历史书中可是犯禁的。这本书确有其高人之处，可书中的错误也确实不少，有些是不应该的，有些也是难以避免的，因为真实的情况在当时他们还不了解。孟德斯鸠说伏尔泰写历史的用意是显耀自己的宗教，这话确有它的道理。在《风俗论》里随处可见他非宗教的宗教。作为一个史学家，伏尔泰最大的缺点在于他是一个理智本位的哲学家，因此不了解人们在感情上的需要。宗教的存在，宗教别派的存在，都有着一个共同的原因，这原因就是人民有对这些教派和礼俗的需要。可是伏尔泰看不到这些。这确是令人遗憾的，不过在他的《路易十四时代》中倒是没有这样的缺陷。

除了科学研究、写历史著作，组织业余剧团演戏以及和朋友畅谈外，伏尔泰在西雷时还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那就是与当时的普鲁士王子，后来的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的交往。

八 普鲁士王子

历史上著名的弗里德里希大帝，即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是普鲁士历史乃至欧洲历史、世界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他在位46年，在位期间不断发起战争。虽然战乱频繁，生灵涂炭，但仍是战功赫赫，使普鲁士由一个较弱的小国家成为在欧洲占据重要地位的强大的国家。而他与伏尔泰的交往，对于他的统治、对于伏尔泰一生的命运，都有着不小的影响。

他们之间的交往始于1736年7月。那时伏尔泰正居住在西雷，忙于研究牛顿的自然科学成果，而弗里德里希则还只是一位王储，年仅24岁。7月里的一天，伏尔泰收到一封来自普鲁士王子的信，信中充满对伏尔泰以及他的思想的赞扬和钦佩。伏尔泰收到信后感到惊异，不知道是什么使得王子对他如此青睐。但他正处于多事之秋，因《哲学通信》、《奥尔良少女》等书得罪了法国的天主教会政府。与邻国一位王子的交往，也许可以使他的身价提高，这样，法国政府和教会就不会像以前那样肆无忌惮地对他加以迫害。伏尔泰出于这些对于自己安危的考虑，同时也出于对这位未来国王的希望，也很乐意与这位王子保持

这种良好的关系。的确，正当他遭受法国宫廷仇视的时候，来自普鲁士王子的友谊对他是一种安慰。因此，伏尔泰在收到信后随即就写了回信，在回信中对弗里德里希大加赞扬。从此，两人开始了频繁的通信往来。据统计，仅在这一年里，弗里德里希给伏尔泰的来信就多达37封。

当时的德国，有着崇尚法国的风气，上流社会的人都以讲法语为荣，讲法语的人被视为有教养的人士。在普鲁士的宫廷，当然也不会两样。弗里德里希从小就在法国人的簇拥下生活，他的教师们几乎都是一些博学的法国人。虽然他的父亲——弗里德里希一世——并不希望自己的继承人过多地致力于学习那些文学、哲学等无用的东西，而希望儿子爱好习武，将来做一名“军人国王”，但在众多的法国学者的教育，以及他的母亲索菲·德罗蒂亚的熏陶和影响下，弗里德里希仍然从小养成了喜爱读书、善于思考的习惯。他在宫廷里网罗了许多著名的知识分子，其中包括伏尔泰的敌人、法国哲学家、文学家莫伯都依。弗里德里希爱好文学、哲学，并且喜欢用法文写作诗和文章。但尽管他在一个法文的小圈子里长大，法文学的很好，但要用法文来写诗，表达情感，终究还嫌有些不够。而像伏尔泰这样一个著名的人物，写过史诗、悲剧，又是当时最优秀的史学家，颇得各国宫廷注意，尽管

是出于不同的目的。弗里德里希自然也不会放过他。他在给伏尔泰的第一封信中写道：“先生，虽然我还不认识你，可是从你的作品中我早已认识你了。你的作品可以说是精神上的宝物。”在两人后来的书信往来中，都充满互相的恭维之词，称赞对方的宽容精神和思想自由。弗里德里希在给伏尔泰的信中经常寄来一些他自己的诗作，请伏尔泰帮他修改、润色。伏尔泰也不论这些诗到底是好是坏，一律地加以赞扬。

伏尔泰很喜爱结交一些王公贵族，并以此炫耀。但这其实只是他保护自己的一个手段，他决不愿意作任何人的附庸，而由某人来占有自己，无论这个人的地位有多么显要。对待弗里德里希也一样。虽然伏尔泰在给弗里德里希的信中时常对他进行一些不确切的恭维，称他“是一个有哲学头脑的王子，是一位会给人民带来幸福的王子”。但当弗里德里希提出希望他到普鲁士宫廷供职时，他仍然加以拒绝，以保卫自己的自由。他的拒绝并没有惹怒弗里德里希，弗里德里希回信称伏尔泰是“人类的立法者”。并且在几天后，弗里德里希给伏尔泰寄来一只镶有苏格拉底胸像的手杖柄，意为把伏尔泰比做苏格拉底。在18世纪的法国，人们把启蒙思想家比做苏格拉底。但伏尔泰并不喜欢苏格拉底的形象，认为苏格拉底只是一个胡言乱语的雅典狂人。因此他把这只手杖柄交还给了弗里德

里希。不过伏尔泰又在他的著作中承认苏格拉底对古希腊盛行的宗教提出的质疑有助于反对宗教狂热和宗教迫害，并且还于1759年写了戏剧《苏格拉底》。

1736年12月，伏尔泰因《摩登人物》一书而又一次得罪法国当局的时候，从西雷逃往荷兰。他这时想到了弗里德里希，把普鲁士作为自己逃亡的目的地。当弗里德里希得知伏尔泰逃离西雷的消息后，通过伏尔泰的好友向伏尔泰婉转表示，自己没有能力在普鲁士保护像他这样一位哲学家。的确，弗里德里希当时只是一位王储，他学习诗歌和哲学是违背他的父亲弗里德里希一世的意愿的。弗里德里希一世还曾经把伏尔泰写给儿子的信公之于众，使法国当局能够抓到把柄来迫害伏尔泰。因此，如果伏尔泰到这位普鲁士王子这里寻求庇护，其结果对他自己只能是更为不利。此外，爱米莉也一直反对伏尔泰到普鲁士去。她认为这种虚荣的旅行对伏尔泰没有任何益处：普鲁士气候严峻，会对伏尔泰的身体造成威胁；伏尔泰的经济收入也不稳定，生活上没有保障，王子也不能保护伏尔泰。爱米莉的阻拦是很有道理的。知道弗里德里希并不希望自己到普鲁士后，伏尔泰就打消了这个念头。但他在弗里德里希充满甜蜜的恭维的言语下，仍没能认清这位王子的真面目，以至在后来的日子里，吃了不少的苦头。

1738年，26岁的普鲁士王储写了一本书《反马基雅维里》。马基雅维里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他在他主要的著作《君主论》中论述了自己的政治思想，认为君主应兼狮子的凶猛和狐狸的狡猾于一身，为了达到政治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不怕运用暴力和欺诈的手段。弗里德里希在《反马基雅维里》一书里，对这种思想大加反对，认为这样做会影响君主的地位和尊严，君主应当用公正、仁善之心治国，而不应用武力和欺诈等。他在著作中还写道：“国王应是国家的第一仆人。”

伏尔泰在他的《路易十四时代》和《风俗论》中就已经表达了他的王权主义思想。他对国王总是抱着很高的希望，认为国王应当深明哲理，以哲学思想治国。他把实现自己这一政治理想的希望放到当时欧洲大陆三大君主国——法国、普鲁士和俄国的君主身上。弗里德里希对文学和哲学的爱好早已为伏尔泰所赞赏，伏尔泰对这位普鲁士未来国王的希望比对别的君主的希望更大。如今弗里德里希写出这部著作，表达的思想内容正合伏尔泰的心意，伏尔泰当然对它大为赞赏。可是王子的原作实在不很高明，因此他要求伏尔泰对该书进行一些修改和润色并出版。伏尔泰一一照办，并为之作序。可是正当伏尔泰已将书稿交给出版商，准备出版时，老国王病逝，弗里德里希继承了

王位。这位新国王明白，虽然自己在书中做了那样的主张，其实并不想真的做那样的君主，而且正相反，自己要做一位兼狮子与狐狸于一身的国王。因此，他意识到，他的那本著作会给自己带来不利的影响，就给伏尔泰写了一封信，说明自己不想出版那本书了，并恳求伏尔泰买下全部版本。伏尔泰收到信后立即赶赴海牙，和出版商协商不出版那本著作，可是出版商基于利益的考虑，认为这本书一定会畅销，拒绝了伏尔泰的要求，只允许伏尔泰修改手稿。伏尔泰无奈，只好尽力在手稿中加进很多毫无意义的话，使书的内容混乱模糊。在那一年里，社会上就流传着五种不同的版本。伏尔泰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维持自己与各国宫廷的关系，不惜为他人做嫁衣裳。但遗憾的是，事情的结果总与他善良的愿望相违背。

九 宫廷宠臣

伏尔泰自从踏进这个社会，多少年来就不断地受到各种各样的迫害。法国宫廷和教会迫害他、整治他似乎已成为习惯，而伏尔泰在此待遇下也已被迫养成受迫害和逃亡的习惯。可是人的命运总有转折的时候，在伏尔泰已到知天命的年纪的时候，他居然一转而为法国宫廷里的红人。他的这种幸运的到来，原因是多方面的。

伏尔泰自觉老年将至，为了自己的声望和体面，不愿意再继续被宫廷视为敌人，也不想一再地到国外逃亡。和法国宫廷修好的愿望，在他的内心开始变的强烈。他对待教会和政府的态度和缓了。1740年，伏尔泰写了一部新的悲剧《穆罕默德》，剧中主人公穆罕默德是一位非常专制阴险的人物，他利用恐吓和欺骗，要求人们对他的绝对服从。伏尔泰在剧中明显地表出了自己反对宗教狂热的立场。穆罕默德是伊斯兰教的奠基者，伏尔泰对伊斯兰教和穆罕默德并非有什么特别的恶感，他只是借他们的形象来批评法国天主教会的宗教狂热。《穆罕默德》首先在法国巴黎以外的省区上演，上演后受到观众的欢迎。伏尔泰没想

到此剧的演出会获得成功，因此受到鼓励，要把此剧搬到巴黎公演。但在巴黎公演的结果并不令人满意，土耳其驻巴黎的大使对剧中丑化伊斯兰教的创始人穆罕默德的内容提出了抗议，伏尔泰的仇人台丰丹纳神甫也指责此剧对基督教不敬。此剧在巴黎只演出了三场，许多政府要员观看了演出。伏尔泰为了和当局搞好关系，并没有把剧本继续公演下去。过后，伏尔泰考虑到与教会的关系的好坏对自己的命运有很大影响，就想把这个剧本题献给罗马教皇本多十四世。他托一位神甫把剧本转交给教皇，并且附了一封信，表示自己十分尊重教皇本人，希望教皇发给自己两枚奖章。本多十四世是一个开明的、理智的教皇，他读过《穆罕默德》剧本后，说这是一部“很美的悲剧”，他读后“非常欣喜”，接受了伏尔泰的题献，并且颁给他两枚有自己肖像的奖章。伏尔泰这样做，主要原因是考虑到自己的个人安危，如果获得教皇的保护，法国天主教会就不会再毫无顾忌地迫害他了。他对他的好友、法国外交大臣达让松侯爵说：“对善良的人进行迫害的那些人将会认识到，我披着圣衣保护着自己。”这正是伏尔泰的目的。

伏尔泰与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友好关系，对于伏尔泰在法国宫廷里的受宠，也有着不小的影响。当时，法国与外国的战争频繁，英法战争、法奥战争，

法国都处于不利的地位。而在战争中，法国要取得战争的优势，与普鲁士的关系至关重要。法国当局认识到，可以利用伏尔泰与普鲁士国王的关系，使普鲁士不偏向英国，而在英法战争中保持中立；并且恢复普法同盟。因此法国当局对伏尔泰加以容忍，并且派他到普鲁士做所谓“侦探”。遗憾的是，伏尔泰在这次作侦探的过程中，不仅没能完成自己的“使命”，还为自己以后的生活留下了祸根。弗里德里希二世险恶的为人，伏尔泰当时还没有充分地认识到。但在当时，伏尔泰却因为与普王的友好关系，确实与法国当局的关系好转了。

当时法国的风气，上流社会的王公贵妇们都有自己的情人，并且是公开的。法国国王路易十五就有不少自己的情妇。伏尔泰与国王的情妇的关系都不错。伏尔泰可不是美男子，而且正相反，可以说长的挺丑。可是他的名望、他的才华、他的金钱、他的幽默，这些资本成了他的助手，他得到不少上流社会名媛的青睐。路易十五以前的情妇夏多罗夫人和伏尔泰一直保持良好的关系，在国王耳边说过不少伏尔泰的好话。这些好话对于伏尔泰的命运有什么样的改善，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可以猜想总不会有什么反面作用。但夏多罗夫人正当27岁妙龄时，突然病故。路易十五很快就又宠幸了另一位夫人，埃蒂奥尔侯爵夫人，即

历史上著名的蓬巴杜夫人。蓬巴杜夫人对法国的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历史有着重大影响。且不管她在历史上是如何影响法国的内政外交，她的奢侈豪华是如何耗费国库的财产，仅论及她与伏尔泰的关系，就给伏尔泰带来好多的运气。蓬巴杜夫人不同于当时其他的夫人们，她有知识、有鉴赏力，重视真正有才气的人。在她的帮助下，法国不少作家的命运有了好转。1744年秋天，伏尔泰和爱米莉回到巴黎，蓬巴杜夫人关照伏尔泰写一个剧本，以庆祝王太子与西班牙公主的大婚。伏尔泰为写这个剧本，把其他工作统统放下，整整用了几个月的功夫，终于写出一部轻喜剧《纳瓦尔公主》。王太子的婚礼在1745年举行，婚礼中上演了这部轻喜剧。上演后的结果很令人满意，国王和王后都很喜欢这出戏。然而伏尔泰本人很清楚，这只是一个很平庸的喜剧，实在说不上是杰出的。爱米莉也是这么评论的，但就是这么一出恭维拍马的喜剧，使他满足了进入法兰西学院的愿望。

在蓬巴杜夫人的帮助下，伏尔泰于1745年4月1日获得路易十五的任命状，任命伏尔泰为宫廷史官，年俸2000法郎。这个位置正是伏尔泰希望得到的。1745年5月，路易十五带领军队在丰特诺瓦与英军打仗，5月15日法军胜利的消息传来，法国人都非常高兴。这是法国军队在这个世纪中第一次

打败英国军队，并且在国王亲自带领、指挥下取得的胜利。当时担任宫廷史官的伏尔泰，立即着手写一首史诗颂扬国王的功绩，这一颂诗定名为《丰特诺瓦》，共300句。这首颂诗写得很成功。伏尔泰既没有添加进什么神秘的色彩，也没有有意贬低对方，而是如实地讲述战争的经过和胜利的取得。路易十五听到别人念给他听这首诗之后，感到非常满意。国王的赞扬使伏尔泰很高兴。

伏尔泰一直非常渴望能进入法兰西学院，成为法兰学院的院士，而他做为当时最伟大的人物，居然没有选入法兰西学院，也确实是一件奇怪的事。伏尔泰在民间的声望很高，但要成为学院的院士，总是不够的。院士的名额固定，只有在出现空缺时才再次选任；当选院士要经过在位院士的选举，而且国王和教会的支持对于能否当选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伏尔泰曾经两次申请成为法兰西学院的院士，但像他这样出众的人物，比他差的远的院士们谁肯接纳他呢？那样岂不是显出自己的无知无能了吗？再说，伏尔泰一再承蒙宫廷和教会的仇恨，他要能当选法兰西学院的院士，那才奇怪呢。

但是这次情况不同了。伏尔泰的死对头、国务大臣弗勒里红衣主教死了，空出了一个院士的席位。伏尔泰立即开始行动，托朋友说情，请蓬巴杜夫人帮助，

并且为了防止教会出来反对，他拿出当初罗马教皇本多十四世给他披的“圣衣”，宣传自己与教皇的友好关系，同时又四处散发自己的一封信，说明自己是信仰上帝的，自己的宗教思想是正统的。

因为伏尔泰本人的努力以及朋友们的帮助，更主要的是因为国王的支持，伏尔泰这次终于当选了法兰西学院的院士。伏尔泰一再地讨好国王、王后和国王的情妇，路易十五对他的看法已经改变。尤其是伏尔泰创作的史诗《丰特诺瓦》和轻喜剧《纳瓦尔公主》很得路易十五的欢心。这才是伏尔泰能当选为院士的真正原因。伏尔泰对当选为院士，实现了自己多年来的愿望，是很满意的，然而对于当选的过程，却感到很气愤。他写道：

我的《亨利亚利》，我的《查伊尔》，
还有我的《阿勒齐尔》，
都从未博得君主的青睐。
我仇敌众多荣誉很少。
终于一篇无聊的滑稽戏，
荣誉和财富滚滚而来。

1746年11月，伏尔泰在枫丹白露被路易十五任命为侍从。他很为这个头衔感到荣幸，经常在自

己的作品上写上这个头衔。不少贵族对此感到不满，认为出身资产阶级的这位诗人，不配得到这样的荣誉。但伏尔泰对这些人的话置之不理，依旧我行我素。

然而，伏尔泰得宫廷欢心的日子并不长。一天晚上，在枫丹白露，爱米莉和王后以及其他一些贵妇人在一起赌博游戏，连连赌输，输光了自己的和伏尔泰的所有的钱。这时，伏尔泰看到，王后在玩一些诡计，因此用英语对爱米莉说：“快停止！你是在和一伙骗子赌博！”伏尔泰以为宫里的人们听不懂英语，但是很不幸，在场的人有人能听得懂。这还了得，竟敢说王后是骗子！王后立即发火，说要给伏尔泰一点颜色看看。回到他们的住处后，伏尔泰和爱米莉越想越怕，担心伏尔泰会被再次关进巴士底狱。因此，他们收拾起东西连夜逃离了枫丹白露。

伏尔泰本来不是个爱附庸权贵，向主子献媚而失掉自己尊严的人，但出于一时的虚荣心的需要，他做了短时间的凡尔塞宫的朝臣。他后来在回忆这段生活时写道：“我在1744年和1745年是朝臣；在1746年改过自新；在1747年悔过了。”“如果我曾经有过这样的时期，那不是我的光荣时期。”的确，伏尔泰和宫廷之间的裂痕是不可弥补的。暂时的和缓只是伏尔泰努力的结果，但这种努力，无论怎么说伏尔泰都不可能持续下去的。

十 逃离凡尔塞

法国宫廷朝臣的日子结束了，伏尔泰又回到了从前逃亡的日子。这时是1747年。伏尔泰和爱米莉从枫丹白露连夜逃出，乘着马车逃到了巴黎郊外的索宫。这里是曼纳公爵夫人的家，爱米莉想去巴黎，可是伏尔泰不想到首都去，因此他们在巴黎郊外分了手。

曼纳公爵是路易十四与蒙德彭夫人的私生子，曼纳公爵夫人则是孔代亲王的孙女。这位夫人生的很矮小，很有魄力，很专横，而且很古怪。她曾经怂恿丈夫坐上王位，并且几乎有成功的可能，但最终由于王室的反感而未能如愿。失败之后，她在自己的索宫中罗致了不少文人名士，俨然一个“在野小朝廷”。她读过不少书，和自己的食客们颇谈得来。她接到伏尔泰要投靠的信，那正是她思而不得的，当然立即把他接了来。

伏尔泰住在索宫，很怕被人发现，因此住在一所偏僻的屋子里，只有晚上才下来和曼纳公爵夫人一起在她的寝室里用餐。公爵夫人非常喜欢与他见面，与他交谈。他们在一张桌子上一同饮酒用膳，一边兴高采烈地交谈，直到天亮。伏尔泰对很多事情都有自己

的见解，他对各种事情发的议论是很受公爵夫人的欢迎。而公爵夫人也有许多从前宫中的轶事讲给他听。曼纳公爵是路易十四的儿子，公爵夫人了解很多自己公公的宫廷里的故事，这些故事对于伏尔泰改写《路易十四时代》非常有帮助。伏尔泰也报答曼纳公爵夫人，他常在晚饭后把白天写的小说朗诵给公爵夫人听。他的这些小说不少是他特地写了为她消遣的。主要有：《巴甫克的幻象》、《查第格》、《默农》、《米克洛曼加斯》等。这些小说都是伏尔泰为表达自己的一些宗教、道德观点而随手写就的，不像他其他的作品那样有比较深刻的思想和尖锐的批评，而是比较轻松随意。曼纳公爵夫人很喜欢这些小说，常常要求伏尔泰朗诵给大家听。伏尔泰的朗诵确实很精彩，仿佛一个真正的演员，因此他的朗诵大受大家的欢迎。大家纷纷称赞他的小说，并要求他把这些小说出版。可是伏尔泰却实在不愿出版，因为他自己是看不起自己的这些小作品的，这只不过是他白天独自一人在小屋里时为排除寂寞而写的小玩意儿罢了。

伏尔泰在索宫的日子过的很不错。除了爱米莉和他的几个很好的朋友，知道他在这里的人并不多，人们以为他出国去了。爱米莉时常来索宫看望伏尔泰。这期间，伏尔泰创作了不少的戏剧和小品。他对戏剧的热爱是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减低的。在索宫，他无法

欣赏戏剧表演，就只好和在西雷一样，组织一个业余剧团，排演自己新创作的戏剧，其实伏尔泰创作和排演戏剧，主要的目的是要讨曼纳公爵夫人的欢心。公爵夫人也确实喜爱观看伏尔泰的戏剧。演员都是公爵夫人府中的客人，女主角通常由爱米莉饰演。她相貌姣好，嗓音优美，并且在伏尔泰的帮助下演戏的天赋也得到开发，扮演女主角还是比较成功的。他们的日子过得兴高采烈。然而，好景不长，伏尔泰一向不惯于在别人的影子下生活。在索宫呆的日子久了，他仿佛倦怠了，这儿并不是他自己的家，他不过是到这里避难而被主人收留的。他的业余剧团的演出越来越随便，他甚至不经公爵夫人同意，就擅自邀请客人来观看演出，有时确实是有些过分。曼纳公爵夫人对此心中已有不满。有一回，她发现有一大群不认识的人到索宫里来看戏，并且听说伏尔泰言谈中对她颇为不敬。这位贵妇人觉得，这是无法容忍的。于是，伏尔泰在这里呆不下去了。

当初伏尔泰逃离凡尔塞宫的时候，他在宫中仍保持着他的职位。因此，他隐居到索宫后的一段时间里，仍时常到巴黎和宫中去执行职务。可是他已经明显意识到，自己无论在巴黎还是在宫中，都是不受欢迎的人。他近几年来得到的幸运，诸如被选为法兰西院士、被国王路易十五任命为宫廷史官和宫廷侍从，得到国

王和王后的宠幸以及蓬巴杜夫人的帮助等，早已被许多人所嫉妒和排斥，如今他已失去在宫中的地位，这些人自然暗自幸灾乐祸。伏尔泰在巴黎和凡尔塞的日子不好过，只得常常到索宫去消磨时光。然而现在，他连这个保护伞也没有了。

恰在这时，又发生了一件事，使伏尔泰在凡尔塞的日子更加难过。他在宫中排演一出戏剧《浪荡子》，蓬巴杜夫人为了取悦路易十五，亲自参加演出，并且让其他一些宫廷显贵也临时客串演员。演出结束后，蓬巴杜夫人把伏尔泰介绍给在场的其他要人。伏尔泰为对蓬巴杜夫人的好意表示感谢，就送给她一首赞美诗，其中有几句是这样的：

你的珍贵的日子来自这个节日
国王从战场上给我们带来和平
敌人减少，朋友增多
双方都注视着你的征服

这首诗严重地得罪了王后，它把国王的胜利和情妇联系在一起，伤害了王后的自尊心。连着两次得罪王后，伏尔泰在巴黎呆不下去了。这样，在1748年初，伏尔泰和爱米莉回到了西雷。

在这段短暂的流亡和落魄的时间里，伏尔泰创作

的一些作品还是很有价值的。他在这些作品(主要是小说)中,抒发自己的政治理想,表达自己的宗教观点,既有趣味性,亦有哲理。其中最主要的一篇是《查第格》,是伏尔泰在索宫时写作的。他在1748年把这篇小说出版了。

《查第格》的主要内容是:在古巴比伦,有一个名叫查第格的青年,相貌英俊,聪明伶俐,品质纯洁,正直真诚。他从不认为自己的意见绝对正确,能够尊重别人的弱点。在伏尔泰的笔下,他是后蒙精神的化身。但是,查第格虽然具有种种的优点,他的这些优点却没有给他带来幸福,而且相反,成了他不幸的源泉。他的未婚妻赛弥尔被权贵抢走,他为了保护她,受到了权贵的伤害,可是当医生认为他的眼睛可能失明时,未婚妻却离开了他;他从沙地上留下的痕迹中,辨认出了狗和御马的大小高矮,但由于不知道它们的去向,却被怀疑是贼,当狗和马都被找回来时,还要他交纳罚金;他保护一个女人,使她免遭一位男人的杀害,但这个得救的女人感谢他的却是一顿辱骂;他写了一首诗颂扬国王,并且刻在石碑上,后来石碑断开,诗意被歪曲,他险些被判砍头;就因为他的拖鞋和王后的拖鞋颜色相同,他差点要被绞死,等等不幸,接连降临到他的头上。

后来,查第格得到了国王的信任,但国王轻信谗

言，猜疑查第格与王后有私情，就要谋害王后和查第格。但在抓王后时抓错了人，把泼妇弥苏弗抓进宫廷。国王被弥苏弗美色所迷惑，娶她为妻。由于国王宠信这个泼妇，把国家搞的一团糟，国王变成一个暴君，引起全国叛乱，人民苦不堪言。

后来，查第格受到王后阿斯达丹的垂青，当上宰相，他用哲学家的方式治理国家，给予人民言论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反对教派之间的成见和宗教狂热。最后，查第格和阿斯达丹结婚，当上国王，从此天下太平，说不尽的荣华富庶，盛极一时，国内的政治以公平仁爱为本。百姓都感谢查第格，查第格却是感谢上天。

从《查第格》这篇小说的结构及内容都可看出，这是将一些东方的传说故事联接起来，一起发生在查第格的身上。但伏尔泰的真正目的，却是假借古代东方的故事，揭露法国的现实。查第格的种种遭遇，都是是非颠倒，善有恶报，使人们强烈地感受到时代的窒息感。这正是18世纪法国封建专制时代的反映。

伏尔泰还在这篇小说中表达了自己在宗教、政治以及君主制的一些看法。他一直主张宗教宽容思想，痛恨宗教专制和教派斗争。在《查第格》中，古巴比伦千百年来有件争论不休的大事，使信徒形成水火不容的两派，那就是：一派主张人们只能用左脚迈进太

阳神庙的大门，另一派则坚决主张用右脚迈进门。查第格对这一矛盾的解决办法，是双脚并在一起，跳进门去。然后他发表一篇演讲，证明神对所有的人都是一视同仁，也不会对左脚或右脚有所偏爱。伏尔泰借查第格之口，表达了自己的宗教观点。

伏尔泰还在《查第格》中宣传自己的自然神论思想。查第格的主人崇拜天上的星辰，查第格告诉他，这些星辰和世界上任何其他物体一样，并不值得崇拜。他的主人说：“这些星辰放出如此灿烂的光，我无法不崇拜他们。”于是，晚上，查第格点亮蜡烛，对蜡烛的光明进行膜拜。他的主人问他在干什么，他说：“我和你一样，崇拜这些蜡烛的光，而不崇拜万物的主人。”于是，他的主人不再只崇拜星辰，而改为崇拜造物主——上帝。伏尔泰写这个故事，是为了说明，真正的信仰应该是崇拜一切事物的创造者、宇宙的主宰上帝，而不是像当时的天主教会要求人们做的那样，用对圣物、面包和水、甚至神职人员的崇拜来代替崇拜上帝。

伏尔泰还在这篇小说中表达了对开明君主的希望。在《查第格》中有两个国王，前一个国王专制残暴，使国家内乱，人民生活极其困苦，而查第格做了国王后，用哲学家的方式治理国家，使国家安定太平，人民过着富裕幸福的生活。伏尔泰原来寄希望于路易十

五能做一位他希望的开明君主，但事实使这一希望破灭，并且，伏尔泰在宫廷中受到种种排挤和刁难，这一切使他失望万分，同时也使他更加清楚地认识到，法国宫廷中没有他的位置。因此，在《查第格》中，伏尔泰表现的比较悲观消极。但是，伏尔泰并不想与法国宫廷完全断绝关系，回到西雷后，他仍在努力缓和与宫廷的关系。

十一 爱米莉之死

回到西雷后不久，他们结识了法国王后的父亲、前波兰国王斯坦尼斯瓦夫一世。斯坦尼斯瓦夫一世住在西雷附近的吕纳维尔城里，和他住在一起的主要有他的忏悔师、耶稣会教士默奴和他的情妇布弗列夫人。这位忏悔师和前波兰国王的情妇不和，想另找一个女人代替布弗列夫人的位置，他想到了夏德莱侯爵夫人。于是，伏尔泰和爱米莉被邀请到吕纳维尔宫中作客。他们对这种交往很高兴，幻想与王后父亲的友谊能够帮助改善他们与王后之间的关系。他们在吕纳维尔受到斯坦尼斯瓦夫一世的欢迎，他们一起组织音乐会、庆祝会、表演戏剧等活动，取悦斯坦尼斯瓦夫一世。爱米莉参加各种活动，和布弗列夫人成为好朋友，非但不是她的情敌，而且还成了她的同党。伏尔泰到吕纳维尔不久就开始生病，斯坦尼斯瓦夫一世对病中的伏尔泰非常关怀，伏尔泰也十分感激这位王上。但是不久，二人的关系开始冷淡起来。宫中的伙食对伏尔泰来说很不适合，伏尔泰和王宫总管阿利奥争吵过几次，并写信给斯坦尼斯瓦夫一世提出抱怨。其实，阿利奥之所以这么做，是受王上的授意。王上和总管都

对伏尔泰的怨言嗤之以鼻。在刚刚受到枫丹白露的宫廷的排斥之后，又受到这个宫廷的冷遇，这一时期对伏尔泰来说确实很不顺利。然而对于伏尔泰即将面临的不幸来说，这些都不算什么了。

斯坦尼斯瓦夫一世的情妇布弗列夫人，同时还有另外一位情人，圣朗倍侯爵。圣朗倍侯爵是一位军官，但是他很崇拜伏尔泰和卢梭。并且自己也很喜欢作诗，虽然这些诗歌并不受人欣赏。他外表风度翩翩，英俊潇洒，很有些诗人的气质。他后来还成为法兰西学院的院士。圣朗倍常常到这个小宫廷来作客，很早就与布弗列夫人有了私情，但由于种种原因，布弗列夫人对圣朗倍逐渐冷淡下来。

恰在这时，伏尔泰和爱米莉来到圣纳维尔的这个小宫廷里。爱米莉和布弗列夫人成为好朋友，但布弗列夫人对伏尔泰和爱米莉之间的亲密关系却甚为嫉妒。圣朗倍受到布弗列夫人的冷待，便转而追求爱米莉。爱米莉和伏尔泰之间，由于伏尔泰的年龄和身体的关系，早已成为柏拉图式的爱情，虽然伏尔泰并不介意，爱米莉却已经有些厌烦了。于是，在这种种契机之下，爱米莉与圣朗倍之间的关系逐渐发展、改变。爱米莉真的爱上了圣朗倍。爱米莉这一年已经43岁，而圣朗倍只有33岁，但10岁的差距，并不能阻止爱米莉的热情。而圣朗倍虽然在向爱米莉献殷勤，其

实并不想真的和她有什么深的交往，因为伏尔泰是他自己所崇拜的人，而爱米莉是伏尔泰的情人。因此圣朗倍对自己和爱米莉的关系不过是逢场作戏。然而事情的发展，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简单。布弗列夫人已厌倦圣朗倍，同时又妒忌伏尔泰和爱米莉的关系。因此看到圣朗倍和爱米莉之间关系的发展，自然是暗自高兴，并且积极撮合他们，给爱米莉一间秘密卧室的钥匙，供他们的秘密约会用。圣朗倍本不想涉足太深，但看到爱米莉对他如此深情，也接受了。尤其是当圣朗倍生病时，爱米莉常常趁晚上没人时来到圣朗倍的卧室，对他进行照顾。爱米莉的举动令圣朗倍十分感激。因此，尽管他并不爱爱米莉，仍然保持了和她的关系。

伏尔泰起初对爱米莉与圣朗倍的来往没有进行特别的注意。他和爱米莉十几年共同生活的感情，使他相信爱米莉不会背叛自己。并且他和爱米莉几乎总是在一起，也想不到在自己的身边会发生这样的事。近来爱米莉的精神很好，他并没有去想是什么原因，而只是为她而感到高兴。

在这期间，伏尔泰和爱米莉仍穿梭往来于巴黎、西雷和吕纳维尔之间。1748年5月，斯坦尼斯瓦夫一世去巴黎看望女儿，伏尔泰和爱米莉陪同前往，随后又回到西雷，小住了一段时间。8月份，他们又

一起去巴黎参加伏尔泰的悲剧《塞米拉米斯》的公演。这部悲剧写于伏尔泰在法国宫廷受宠的时期，取材和《俄狄浦斯》一样，也是来自希腊的传说故事。大意是：塞米拉米斯是女神耳刻托的女儿，出生后不久就被母亲抛弃。一群鸽子救了她，从邻居牧人家偷些乳汁喂养她。她长大后嫁给了亚述国王尼诺斯的谋士翁涅斯。塞米拉米斯很有智慧，帮助丈夫和国王解决困难，征服别国。国王尼诺斯被她所吸引，向翁涅斯提出，用自己的女儿换取塞米拉米斯。翁涅斯拒绝了，尼诺斯便以死刑相威胁，翁涅斯因绝望而自杀。之后，塞米拉米斯做了王后，生下了一个儿子。尼诺斯死后，塞米拉米斯继承了王位，她亲自进行多次进军，征服了几个国家。后来，她变成了一只鸽子，飞到天上，成为了神。这部悲剧其实很一般，但引起的反响却很大。公演后引来很多的观众，连演15场，并且在枫丹白露专场为王室演出。1749年，伏尔泰出版了《塞米拉米斯》，并把自己给基里尼红衣主教的一封信作为这个剧本的序言。伏尔泰在这个序言中谈及自己对古代戏剧和当代戏剧所作的比较和看法。后来，这篇序言常常被冠以标题《论悲剧》，单独发表。他认为古代戏剧和现代戏剧各有长处，不应过多地注重某一方面而完全否定另一方面。另外，伏尔泰还在这篇序言中谈及自己对莎士比亚的看法，他认为莎士比

亚的戏剧中一些东西是粗俗野蛮的，不符合戏剧的法则，但同时又说，在《哈姆莱特》中，可以发现一些无愧于最伟大的天才的崇高特点，如剧本中鬼魂的出现。并且在《塞米拉米斯》中，伏尔泰借用了这一情节。

《塞米拉米斯》在巴黎公演之后，伏尔泰和爱米莉回到西雷，准备在那里继续进行他们的工作。但是，这时布弗列夫人来了一封信，使爱米莉无法静下心来完成计划。信中写道，布弗列夫人想要使圣朗倍再次成为自己的奴隶。爱米莉感到很担心，频繁地写信给圣朗倍，向他表白自己的感情。十月份，伏尔泰和爱米莉又来到吕纳维尔，和圣朗倍重新相聚。爱米莉真心爱上圣朗倍，想使自己和圣朗倍的关系长期保持下去，便想尽办法，使斯坦尼斯瓦夫一世在这个小宫廷中给夏德莱侯爵一个职位。这样，爱米莉就可以长期呆在圣纳维尔了。

然而，伏尔泰虽然并未过多注意圣朗倍和爱米莉的关系的发展，仍然还是发现了这件事。这次的发现纯属偶然。一天晚上，伏尔泰为《路易十五史》工作了一整天之后，想和爱米莉说几句话。前厅里没有仆人，伏尔泰便径自闯进爱米莉的房间，发现爱米莉和圣朗倍正在沙发上“谈着诗歌和哲学以外的事情”。伏尔泰见此情景勃然大怒。圣朗倍也不甘示弱，向伏

尔泰提出，如果他愿意的话，可以进行决斗，地点、时间和武器由伏尔泰决定。圣朗倍是位军人，且年轻力壮，而伏尔泰已进入老年。因此，伏尔泰并不愿意和他决斗。他很气愤地回到自己的房间，吩咐仆人朗格曼备车，准备当晚就离开吕纳维尔，去往巴黎。朗格曼觉得很不解，就去问爱米莉是怎么回事。爱米莉把实情告诉了他，并让他尽量拖延时间，等待她向伏尔泰解释，使伏尔泰平静下来，改变主意。朗格曼于是回答伏尔泰，到处都找不到车。伏尔泰让朗格曼第二天早上出去买一辆。朗格曼去告诉爱米莉，伏尔泰尚未休息。爱米莉走进伏尔泰的房间，开始劝慰伏尔泰。伏尔泰的怒气尚未平息，他大声喊道：“难道你认为我看见了这些情形后还会相信你吗？我把我的一切贡献给了你，而这些就是你给我的回报！”爱米莉回答道：“不，我仍然爱你，并且永远爱你，但长时间以来，你说你精力衰退，无能为力，我为此非常难过。我不希望你死，你的健康对我来说非常重要。而你也关心我的健康。当你发现自己不能再有助于我的健康，而你的朋友能做你所不能做的事情时，你怎么能够发火。”她的一席话使伏尔泰转怒为乐，他笑着对爱米莉说：“啊，夫人，你的理由当然是对的，但你应当避免这些事情在我眼前发生。”于是，二人重归于好，各自回到房间休息。第二天，圣朗倍

仍要与伏尔泰决斗。爱米莉对他说，伏尔泰已经老了，并且名气太大，他不应与伏尔泰决斗。因此，圣朗倍去向伏尔泰请罪，伏尔泰向他说：“孩子，你没有错，是我的过错。你正当爱和被爱的年纪，而我已经是老人了。尽管享受你的幸福吧。”于是，一切重归于平静。

但平静的时间并没有保持很久。不久之后，伏尔泰和爱米莉回到西雷。本来十分活泼的爱米莉，现在居然开始忧郁起来，整天神情恍惚。原来，她是怀孕了。这时是1749年，爱米莉已经44岁了。伏尔泰听到这件事情，觉得很不愉快。既然孩子并不是自己的，他就不愿意接受这个孩子。但是他是爱爱米莉的，因此不愿向爱米莉表现自己的不快。并且为了让爱米莉高兴，还给圣朗倍写了封信，告诉他发生的事情。圣朗倍收到信后立即赶来了。

这样一来，三个人就面临着一个难题：即这个孩子该说是谁的？伏尔泰不肯接受这个孩子，但圣朗倍如果接受这个孩子，则他自己和爱米莉就都会名誉扫地。而要说孩子是夏德莱侯爵先生的，那更没有道理。因为夏德莱侯爵夫妇已经17年没有生活在一起了。伏尔泰想了个办法，他们写信邀请夏德莱侯爵来到西雷，爱米莉打扮得花枝招展，美丽动人，对侯爵先生异乎寻常地亲切。夏德莱侯爵看到自己竟受到这样的

待遇，十分兴奋，向侯爵夫人大献殷勤。于是，夫妻两人之间又产生感情。这样过了三个星期，爱米莉告诉夏德莱侯爵，她又怀孕了。侯爵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并把喜讯通知了所有的客人。客人们纷纷向侯爵道喜，并举行了一个庆祝会向他表示庆贺。问题就这样解决了。每个人都很满意，结果皆大欢喜。

在爱米莉怀孕期间，伏尔泰开始了和狄德罗的来往。1749年6月，伏尔泰收到一位法国作家寄来的邮件，这位法国作家就是狄德罗。狄德罗当时年仅35岁，后来成为和伏尔泰、卢梭齐名的启蒙思想家。他对伏尔泰满怀崇敬，他走上这条道路，正是受伏尔泰的指引。据说，有一天，无所事事的狄德罗正和女友在街上闲逛。他们走进一间小书店，狄德罗随手拿起一本书，正是伏尔泰的《哲学通讯》。狄德罗立刻被这本书所吸引，忘记了身边的一切，一口气读了两个小时。走出书店，他来到塞纳河边，思考着书里的内容，想往着书中所谈的英国的自由和开放，而这时的法国，还在受着教会和贵族的压迫和愚弄，他的思想从此发生了变化。这个传说无论是否完全真实，狄德罗走上革命道路是在伏尔泰的带领下，这一点是无疑的。在伏尔泰的启发下，狄德罗成了一名勇敢的反封建、反宗教的战士。他完成了他的著作《哲学思考录》和《怀疑论者的散步》。现在，他的第三部著作

也已完成，也就是他寄给伏尔泰的《代明眼人参考的谈盲人的信》。他在这本书中以唯物主义的观点讨论了认识的来源和范围。伏尔泰读过这本书后，回信给狄德罗，称赞他这本书坦率而深刻，并对他的认识论观点表示了一些赞同，但对狄德罗提出的无神论表示异议。最后，伏尔泰邀请狄德罗来和他一起共进“哲学的便餐”。

狄德罗收到信后立刻回信，表示收到伏尔泰的信是自己一生中的伟大时刻。这几封信的来往，是两位大哲学家联系的开始。不久以后，狄德罗因《谈盲人的信》而被捕，被关押在文森监狱。伏尔泰得知这个消息，很想帮助狄德罗。正巧，文森监狱的管理员是夏德莱侯爵的亲戚，伏尔泰便让爱米莉给那位亲戚写信，请他在监狱中对狄德罗多加照顾。

爱米莉在怀孕期间，仍未停止手头工作，她有一种死亡的预感，认为自己会因难产而死去，因此她加紧工作，翻译牛顿的著作，很少休息。1749年9月3日，爱米莉的产期已到，她和平时一样，坐在书桌旁工作，突然感到有些不适，就呼唤女仆，女仆还没来时，一个小女孩就已经生了下来。生产如此顺利出乎爱米莉的预料。然而，她还是没有逃出死亡的魔爪。她得了产褥热病，孩子出生六天后，她去世了。

爱米莉的死对于伏尔泰来说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打

击。他连连哭泣，悲痛之极，一个人走出府第，跌倒在地。圣朗倍跟着他出来，扶起了他。伏尔泰醒转来时看到是圣朗倍，就哭着对他说：“啊，朋友，就是你害死了她。你怎么能给她一个孩子。”接连很多天，他呆在西雷庄园内，悲伤不能自己。西雷到处是爱米莉的影子，是她把伏尔泰从危急中解救出来，双双到这个荒凉的地方，又用她非凡的巧妙的艺术之手，把这个地方装点成充满爱情、友谊和学术气氛的宫殿。如今，爱米莉不在了，伏尔泰也就无法独自在这里生活下去。他到了巴黎，但悲伤并没有减轻。几乎没有人能和他说话。他的朋友们对他的如此悲痛感到难以理解。他们久已知道，伏尔泰对这位情妇早已感到厌倦。但伏尔泰自己很明白，爱米莉对自己意味着什么。他对他的外甥女，同时也是他后来长期的情妇德尼夫人说：“我失去的不是一个情人。我失去了半个自己，失去了构成我的灵魂的那个灵魂，失去了20年的朋友。”

的确，伏尔泰和爱米莉之间的深厚关系，以及爱米莉对伏尔泰的影响，不是几句话所能说的清的，也不是一般人所能够了解的。他们一起共同生活了16年，并不是合法夫妻，但彼此的感情却比夫妻之间还要亲密默契。伏尔泰大部分杰出的作品，都是在西雷时期，与爱米莉相伴时完成的。爱米莉不仅给他提供

了一个舒适的生活和写作的环境，并且用自己的努力精神深深影响了伏尔泰。她勤奋、刻苦，工作起来不知时间，并且鼓励伏尔泰和她一样投入工作。就是在她的影响下，伏尔泰才对自然科学的研究感兴趣，他的一些重要著作也是在爱米莉的要求下写作的。他们在一起的时光里，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多次邀请伏尔泰到他的宫廷，就是在爱米莉的阻止下，伏尔泰才避免过早地受到普鲁士王的欺骗、愚弄和迫害。我们甚至可以这么说，如果爱米莉仍然活着，那么伏尔泰以后所受到的痛苦和打击就会少的多。伏尔泰一生没有结婚，在他的一生中，有过很多女人，然而其中最重要的是爱米莉，这一点是没有人能够否定的。

斯坦尼斯瓦夫一世对夏德莱侯爵夫人的去世非常难过。他为她修了一座墓。葬礼结束后，伏尔泰不愿再停留在这个令人伤心的、充满美好回忆的地方。他来到巴黎，再没有回到过这个伤心地，直到死后，才被运回这块美丽的土地。

十二 自然神论与税制改革

爱米莉死后，伏尔泰不愿一个人继续生活在西雷这个有着无限美好回忆的地方，但又不愿去巴黎。他曾想过去几个地方，但后来却因种种原因而放弃了。他还是回到了巴黎。他的外甥女德尼夫人在巴黎，他们之间的关系很亲密。他回到巴黎后，不愿住进他原来和爱米莉购买的房子，怕睹物思人，引起对以往的回忆，增添自己的痛苦。但是不久，他就克服自己的这个心理，仍然搬进了这座房子。之后不久，德尼夫人也搬了进来。

伏尔泰和德尼夫人的关系，在伏尔泰的生活中也很重要。应该说，除了爱米莉以外，德尼夫人是伏尔泰一生中最重要的人。其实，伏尔泰和德尼夫人的关系，当爱米莉在世时就已经存在，爱米莉对德尼夫人也有所提防，但由于她自己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也就没有加以很大的注意。但爱米莉在世时，伏尔泰不愿离开她，就没有公开自己和德尼夫人的关系。如今，爱米莉已去世了，伏尔泰虽然非常悲伤，但是他仍要活下去，仍要振作起来，因此，他就来到了德尼夫人的身旁。德尼夫人是伏尔泰的妹妹玛利亚的长女，几

年前丈夫德尼先生去世，就一直寡居。她爱她的小舅舅，两人一直保持着亲密的关系。她天性快乐活泼，对人热情，很受客人的喜爱，因此她的家中常常宾朋满座。伏尔泰正需要摆脱爱米莉去世给他带来的阴影，这样的生活对他来说正合适。

伏尔泰对戏剧的热爱一直是那么强烈，回到巴黎后，他就又开始了戏剧的写作。虽然德尼夫人的陪伴减轻了不少他因失去爱米莉而引起的痛苦，但最终真正使他重新振作起来的还是戏剧。他回到巴黎不久，法兰西喜剧院的演员们就请他写一个剧本。伏尔泰于是完成了一部悲剧《俄瑞斯忒》。这部悲剧和《俄狄浦斯》和《塞米拉米斯》一样，也是取材于希腊的传说故事。它写于爱米莉尚未去世之时，因爱米莉的死而中断了。如今，伏尔泰把它继续写了出来，交给喜剧院进行演出。

《俄瑞斯忒》的大意是：俄瑞斯忒是阿伽门农和克吕泰涅斯特拉的儿子。阿伽门农被妻子及其情夫埃癸斯托斯所害。俄瑞斯忒被姐姐厄勒克特拉所救，到他的姑父、福喀斯国王斯特洛菲俄斯家里住了7年，同王子皮拉得斯成了好朋友。俄瑞斯忒长大后，决定为父亲报仇，阿波罗神传谕他去杀死他的母亲和埃癸斯托斯。于是阿瑞斯忒遵照神谕，在皮拉得斯帮助下杀死了两个仇人。复仇女神要追究他的杀母罪。阿瑞

斯忒在阿波罗神的帮助下逃到雅典城。雅典娜女神将案件提交法庭，俄瑞斯忒为自己辩护：他的母亲杀死了自己的丈夫，同时也就是杀死了他的父亲，他为自己的父亲报仇是理所应当的。但复仇女神控告他说，杀害生母是最严重的罪行。最后，法庭投票表决俄瑞斯忒有罪还是无罪，双方票数相等，这时雅典娜女神投票支持俄瑞斯忒无罪，于是，俄瑞斯忒得救了。

这个悲剧完成后，剧院就进行了公演。但和伏尔泰以及大家的预想相反，这次公演并没有取得成功。这给伏尔泰造成了一些打击。尽管他对这个剧本进行了多处修改，仍未能成功。

在这期间，伏尔泰除了进行戏剧的创作，还同时在进行另外一项重要的工作，那就是启蒙时期的一部重要著作《百科全书》。要完成这部书的最开始的作者是狄德罗和达兰贝尔。达兰贝尔也是启蒙时代的一位重要的思想家和科学家，伏尔泰对他评价很高。达兰贝尔性情和蔼可亲，很谦虚，很有才华，颇有建树。狄德罗因《谈盲人的信》而在文森监狱被关押了几年，直到1749年10月才获释出狱。他找到达兰贝尔，主张合作出版一部《百科全书》，他们的这一举动受到当时许多文人的支持，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霍尔巴赫、爱尔维修等人先后加入这一活动，他们被称为“哲人党”，后来又被称为“百科全书派”。这

样，启蒙运动就有了组织的力量，而不再是像以前那样由个别的思想家独自战斗了。

伏尔泰对狄德罗和达兰贝尔发起的这一活动非常支持，并说“这项事业将是法国的光荣和它的非难者的耻辱”。他和狄德罗和达兰贝尔建立起亲密的联系，但这时也是伏尔泰和卢梭不和的开端。他们二人虽然同是启蒙时代重要的思想家，但他们之间的关系却自始至终都不和谐，从彼此最初的不信任、不真诚，一直发展到最后的互相攻击、彼此仇视，关系一直没有和缓过。这确实是一件遗憾的事。

伏尔泰支持《百科全书》的事业，同时也在为自己的信仰进行辩护。他是个自然神论者，认为上帝是存在的，但上帝创造了这个世界之后，就不再插手世上的事情。他的朋友、英国的博林布罗克勋爵去世后，他的遗作被遗嘱执行人发表，由于其中有关于自然神论的内容，遭到教会的攻击。伏尔泰于是开始为自然神论辩护。他先是匿名发表了《为英国绅士博林布罗克辩护》，文中主张宗教宽容，反对教权，表达了自己对宗教的看法。

伏尔泰为自然神论辩护的最重要的作品，是《五十个说教》。这本书讲的是50个有思想的哲人发表的50个演讲。通过这50个演说，伏尔泰揭露了基督教中一些自相矛盾的地方，以及基督教义的残忍虚

伪和牧师的欺骗行为，同时宣扬了自然神论的思想。这本书是伏尔泰首次公开反对基督教的著作，但文中并未攻击法国天主教会的特权和专横。在路易十五的统治下，法国连连发动战争，造成国库虚空，人民负担加重。路易十五宠爱情妇蓬巴杜夫人，而蓬巴杜夫人挥霍无度，极尽奢侈，更引起人民的不满。国内的各种矛盾已日益尖锐起来。为了改善国内的财政和经济状况，财政总监马肖尔特向路易十五提出税制改革计划，要求路易十五颁布法令对全国所有的臣民征收1／20税。路易十五公布了马肖尔特起草的法令，废除什一税，改行1／20税，于1750年1月1日起实行。1750年，伏尔泰发表了一本小册子，这本小册子就是由税制改革引起的。

马肖尔特的税制改革最关键的一点，是向全体臣民一律公平地征收税款。在以前的法国，贵族和教会享有特权，不必交税。而现在的税制改革，打破了这一特权，引起了教会和贵族的强烈反对。尤其是教会，他们宣称他们的财富是保护穷人的，因此不能纳税。这当然是骗人的鬼话。教会非常富裕，而要求他们纳税就会降低他们的经济实力。因此，教会坚决抵制1／20税。

伏尔泰是马肖尔特的税制改革的坚决支持者。并非仅仅出于他对教会的反感，而且为了整个法国的前

途和命运。他给马肖尔特写信，表达了自己对他的支持。他说，每一个社会等级都应对国家作出自己的贡献，这是他们的责任。马肖尔特的改革是平等的，因为它要求人们不分阶层地、没有差别地履行自己的义务。

1750年6月，伏尔泰发表了他的政治性的小册子《圣贤和百姓的声音》，这是他的第一部政治著作。伏尔泰在这本小册子中，用尖锐、简洁的语言，表达了自己对这次税制改革的支持。伏尔泰主张法国实行君主制，认为国家的主要决定权力应当在国王的手里。一个国家不能有两个最高权力，最高权力应属于国王，教会应当听从国王的命令。既然国王签署公布了税制改革的法令，教会就应当执行它。这部小册子并非是代表着人民的利益，而是站在君主的立场上，为王权辩护。与以往不同，这一次伏尔泰是以自己的本名发表的这一著作。遗憾的是，由于教会和贵族的反对，马肖尔特的税制改革未能被坚持执行。在经过了一年多的争论之后，路易十五撤回了自己发布的法令。尽管马肖尔特、蓬巴杜夫人以及其他一些支持税制改革的高级官员强烈要求执行这个改革方案，但由于教会的反对以及王室成员的不支持，这一次税制改革最终失败了。但伏尔泰并未亲眼看到这个结局。他在发表了《圣贤和百姓的声音》之后，就离开了法

国，接受普鲁士王弗里德里二希世的邀请，来到了普鲁士的宫廷中。伏尔泰之所以接受这一邀请，是想离开法国，以便能把法国看的更清楚。正如他在给德尼夫人的信中所说：“要写一个国家的历史，人们必须远离那个国家。”

伏尔泰要离开法国，还必须得到宫廷的允许。伏尔泰向路易十五的大臣提出请求，路易十五根本不予理睬。所以，伏尔泰只好请弗里德里希写信给路易十五，请求他同意让伏尔泰留在普鲁士的宫廷中。路易十五毫不在乎地答应了。他对他的的大臣说，现在普鲁士的宫中多了一个疯子，而法兰西的宫中少了一个疯子。

伏尔泰去往普鲁士，本想偕德尼夫人同行，但吝啬的弗里德里希不肯拿出这部分旅费。于是，伏尔泰独自一人，来到了普鲁士。

十三 普鲁士王

“一切的开端总是可爱的”。伏尔泰刚刚到达柏林，受到了极为隆重的迎接。他被尊为贵宾，弗里德里希亲自迎接他下车，宫廷中为他举行庆祝会，庆祝他的到来，表演他写的戏剧。弗里德里希给他2万法朗的年薪，给他环境优雅美丽的宫廷居住，给他足够的仆人使唤，使他像主人一样可以随意地生活。人们对他都非常尊敬，到处都在谈论伏尔泰。这样的情景，确实与法国宫廷完全不同。伏尔泰感到十分满足，他在给朋友的信中，盛赞了弗里德里希对他的盛情款待，并与法国宫廷对他的迫害进行比较，倾诉了他心中对法国宫廷的怨恨和不满。弗里德里希致信询问法王路易十五，他是否可以将伏尔泰留在普鲁士的宫中，得到的回答当然是可以。法王一点也反对这个请求，甚至允许伏尔泰保留法国的年俸和财产。弗里德里希终于真正地拥有了伏尔泰，他为此而感到高兴。

弗里德里希将伏尔泰罗致到宫中，他的目的一是想让伏尔泰装点他的宫廷，光耀他的门楣；二是想让伏尔泰作他的高级文学侍从，为他修改法文诗文。伏

尔泰对这一工作是兢兢业业的。他很认真地修改这些并不值得修改的诗文。但时间长了，这样的工作无论如何是令人厌烦的。伏尔泰做事不太小心，他向人抱怨说这是在给国王洗脏衣服。有人把这话告诉了弗里德里希，伏尔泰和弗里德里希之间的矛盾已经暴露出来了。

不仅仅是为国王修改拙劣的诗文令伏尔泰不快，还有更让他不愉快的事情。伏尔泰是这样有名气的人物，当他到达普鲁士宫时，人人对他充满了尊敬。然而他的光芒是这样强烈，掩盖了别人的光；普鲁士王对他又是这样殷勤，难免引起人们的忌妒。因此，伏尔泰到达普鲁士宫不久，他就已经有不少的一批敌人了。

这帮讨厌伏尔泰的人中，有几位代表人物，其一就是莫伯都依。莫伯都依是一位优秀的数学家，很有才华，但比起伏尔泰来当然差的远。他心胸狭隘，忌妒心强，把伏尔泰看做是自己的敌人，因为在伏尔泰到来之前，他一直是普鲁士宫中最杰出的人物。他当时任柏林科学院院长。伏尔泰后来与他发生了很大的争执。其实他们二人早就互相认识，他们是一起去的英国，一起从英国回到法国，可是莫伯都依处处都比伏尔泰幸运，当莫伯都依得到各种荣誉、青云直上时，伏尔泰却在受着种种的迫害，不断地流亡。这就已经

让伏尔泰心中够不平衡的了，还有更让他耿耿于怀的事，那就是，爱米莉曾经追求过莫伯都依，他们曾经一度是情人。因此，现在二人同在普鲁士的宫廷中，不仅莫伯都依将伏尔泰视为自己的敌人，伏尔泰也在无形中视莫伯都依为敌了。

还有一个人物，在普鲁士宫中，让伏尔泰无法忍受。这是一位法国诗人，名为亚诺·巴哥拉。当伏尔泰在法国时，就有人告诉他，弗里德里希对这位庸俗的法国诗人非常推崇，简直把他看作伏尔泰一样。弗里德里希赠给这位亚诺·巴哥拉一首诗，其中有几句是这样的：

法兰西的阿波罗，
已经走入颓唐的路，
来吧，你来光照世界吧。

伏尔泰对这首诗恼怒了。他随即回敬了弗里德里希一首诗，并决定到普鲁士宫中，同时要赶走这位亚诺·巴哥拉。弗里德里希在伏尔泰到来之后，果然驱逐了这位诗人。

这帮小人物对伏尔泰不友好，着实给他带来了一些烦恼。他们在伏尔泰和弗里德里希之间互传恶言，制造矛盾，使两人的关系日见隔阂、恶化。伏尔泰传

说的洗脏衣服的话，就是由他们传给弗里德里希，并且加进去许多的解释。而弗里德里希在和人说起伏尔泰时说：“我至多再需要他一年，一年之后，桔子汁挤干了，桔子皮就要扔掉。”这话也是由这帮人说出去，最后流传到伏尔泰的耳中。伏尔泰也已开始警觉了。他在给友人的信中：“我发觉他们正在挤压桔子，必须考虑把桔皮救出来。”

伏尔泰和弗里德里希的矛盾日益加深。最后的导火线是莫伯都依的一本书。莫伯都依发表了一篇名为“论宇宙学”的论文，文中试图用数学公式论证神的存在，提出了“最低限度律”的原则，认为自然界总以最低限度分配各种原动力，并扬扬自得地用这一“最低限度”来解释一切。当时柏林科学院的院士葛尼希指出，这一定律在德国大哲学家莱布尼兹的学说中已经有过了。莫伯都依否认这件事，痛斥葛尼希的谬误，他要求葛尼希拿出莱布尼兹的手稿作为证据。葛尼希拿出了手稿，但被柏林科学院宣布是赝品。葛尼希于是被迫辞职。后来葛尼希又发表了一篇文章，充分证明了莱布尼兹的手稿是真实的。伏尔泰觉得，莫伯都依的行为未免太霸道，便写文章批评他。莫伯都依当时身为柏林科学院院长，受到这样的批评，就等于柏林科学院受到批评一样。弗里德里希不能忍受这样的批评。恰逢莫伯都依因酗酒而卧病在床，不能

应战，弗里德里希便亲自写文章批驳伏尔泰。在他的这篇匿名文章中，根本没有涉及他们所争论的问题的实质内容，而只是大肆对伏尔泰进行人身攻击，说他是撒谎者，轻浮而无知。伏尔泰读了这篇文章后，知道是弗里德里希所写，并确信，弗里德里希根本没读过葛尼布的文章。

这件事本身只是一个小过程，但它是后来引起更大风波的前奏。随之而发生的事情，令伏尔泰的生活充满了痛苦。

莫伯都依发表了一个论文集和一个小册子《关于科学的进步》，书中内容极为荒唐，借医生阿加基亚之口，建议建立这样一个城市：在城市的地面上打出一个洞，一直通向地球的核心；全城的居民只准使用拉丁语；在治疗病人时，必须给病人的身上涂满树脂，以免消耗他们的生命力。还建议在这个城市中，解剖印第安人中马塔哥尼亚的脑子，以便研究灵魂的特性等。这些方案着实奇特。莫伯都依还提出要去极地探险，用炸药打开埃及金字塔等。其实莫伯都依的这些设想中，有不少是有创造意义的，但因为其中大部分在当时看来都很荒谬，因此令人难以理解及同情。伏尔泰本来是个文人，对科学并没有什么深刻的理解和独到的见解。因此他对莫伯都依的建议和设想极不以为然。但是弗里德里希支持莫伯都依，伏尔泰不敢明

刀明枪地与莫伯都依相对抗。因此他采用自己的老办法，假借他人之名写了一篇讽刺文章，名为《教皇御医，阿加基亚博士的讽刺》。他在文中写道，阿加基亚医生向宗教裁判所提出指控，指出这本《关于科学的进步》的小册子并非可敬的科学院院长所写，而是一个医学后生假冒莫伯都依的名义写的，目的是败坏可敬的院长的名声。阿加基亚医生声称他反对这本小册子中所提出的种种荒唐的设想和建议。伏尔泰写这篇讽刺文章，目的是攻击莫伯都依，同时攻击普鲁士在学术上的专制和政治上的独裁。因此受打击的不仅仅是莫伯都依，弗里德里希也因此而十分恼怒。他知道这本书是伏尔泰所作。他把伏尔泰叫到自己的房间，严厉要求他销毁所有的书。并且把这本书一章一章地读过后投进大炉里。

伏尔泰不愿接受这无礼要求，他仍要继续出版这本书。弗里德里希威胁他说，如果伏尔泰不马上销毁这些书，他就会把他投入监狱。之后，弗里德里希决定公开烧毁全部《教皇御医，阿加基亚博士的讽刺》。这一行为被付诸实施，地点就在柏林公共广场。伏尔泰住处的窗户正朝广场，伏尔泰亲眼目睹了这一场面。书被烧完后，弗里德里希派人给因生病而未能到场的莫伯都依送去一些纸灰，称它们是一点“爽身粉”。

这件事真的惹怒了伏尔泰。他决定采取行动向弗里德里希报复。他把弗里德里希当初给他的一切宫廷高级侍从的徽记——钥匙和勋章，都退还给了弗里德里希，并附上一封很简短的信，向他辞别。弗里德里希又觉得不能就这样让伏尔泰走，否则会引起不利于自己的舆论，因此不愿接受伏尔泰退还的东西。但伏尔泰这时已不怕再得罪这位普鲁士国王，仍然是扬长而去了。

可是伏尔泰忘记了，他现在仍在普鲁士的国土上，他甚至不能自由地离开这片土地。1753年3月，伏尔泰离开柏林，临行时，弗里德里希只是冷冷地说了一句：“祝您旅行平安。”这种情形和伏尔泰到来时受到热烈欢迎的场面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伏尔泰的心情郁闷，加上旅途劳累，因此刚到法兰克福就病倒了。本来生病就够让他痛苦的了，还有更让他难过的事情在后头呢。弗里德里希想起自己有些诗文的稿件在伏尔泰这里，怕这些诗文以后会成为伏尔泰嘲笑、攻击自己的把柄，便派人前来索要。伏尔泰坚持不予返还。确实如弗里德里希所想，伏尔泰拿着这些诗文，并非其中有什么特别出色的地方令伏尔泰不愿返还，而是伏尔泰想在以后把这些拙劣的诗文公开发表，使大家都能看出这位所谓开明君主的普鲁士国王的丑恶嘴脸，同时他还想借这些诗文对弗里德里希进行讥讽

和嘲弄。在双方坚执不下时，国王的使者便把伏尔泰软禁了起来。前来法兰克福迎接伏尔泰的德尼夫人，发现舅舅居然成了普鲁士的囚徒。她是这样刚强而目空一切，想尽办法和普鲁士斗争。她写信给能帮助自己的人求助，并且喝了很多酒，借助酒劲大骂国王的走狗。伏尔泰最终妥协了，他把诗稿箱子交了出来。可是弗里德里希仍不罢休，他把伏尔泰又囚禁了五个星期。最后，伏尔泰获释了。他放弃了自己的财物，独自回到法国国界内。德尼夫人则回了巴黎。伏尔泰觉得很不甘心，他曾经又回到法兰克福，想要通过法律程序索回自己的财物。可是他被告知，如果他这样做，必定会败诉。伏尔泰只好失望地回到法国，不满地说：偷窃不需任何正式的手续，而索赔却需要大量的手续。

伏尔泰的这一次普鲁士之行就这样结束了。三年普鲁士宫廷侍从的生活，给伏尔泰留下了沉痛的教训。后来普希金在一篇文章中评论伏尔泰这段经历时，也沉痛地问道：“柏林什么吸引他呢？为什么一个毫无权利强迫他这样做的外国君主的顽固恩典会换取他的独立身份呢？”实际上，伏尔泰当初之所以决定来普鲁士，是有多方面的原因的。普鲁士国王对他无限的谄媚使他信以为真了。他曾这样对别人讲过：“我们的兄弟、作家们通常不得不向国王献媚，但这一位国

王，他本人却自顶至踵无所不至地赞扬着我。”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伏尔泰一直坚持的开明君主制。伏尔泰虽然崇尚英国君主立宪的政治制度，因为这样的政治制度之下，人民有更多的民主与自由，但同时又认为，各个国家都有各自的特点，不能互相照搬。在法国的情况下就应实行君主制。伏尔泰一直坚持王权主义，希望国家大权握在国王手里，同时又实行开明君主制，这样，在开明君主的统治下，国家就会日益强大，人民生活也会更加幸福。可是法国的现实教育了伏尔泰，路易十五决不可能成为他所希望的那样的开明君主。恰在这时，弗里德里希与他探讨宗教、哲学和诗歌，并且对他表示了无比的崇敬，这使得伏尔泰得出了一个错误的结论，认为弗里德里希将会成为一位他理想中的开明君主。因此，他想到普鲁士去，帮助弗里德里希对国家进行社会改革。他就是怀着这样的幻想来到普鲁士，却想不到在这里做了3年的高级侍从，洗了3年的脏衣服。弗里德里希从对他百般的谄媚和赞扬，到对他恶语相加，无礼相待，而伏尔泰则从来时的满怀期望，到走时的悲苦无奈，真是具有一些戏剧性的变化。伏尔泰在还给弗里德里希高级宫廷侍从的钥匙和勋章时，还附了一首短诗：

我接受时满心欢喜，

我璧还时一腔悲苦，
正如一个妒忌的情人，
在疾懣时交还情妇的肖像。

现在伏尔泰又成了无处可去的人了。他已经 60 岁了，不想再像以前那样过着不断动荡的生活。

十四 狡兔三窟

伏尔泰屈辱地离开了普鲁士。现在他要往哪儿去呢？他回到了巴黎，可是巴黎并不欢迎他。路易十五对他的情妇蓬巴杜夫人说：“我不愿伏尔泰回到巴黎来。”伏尔泰也已预感到，要想在巴黎栖身，是不可能的了。并且他也不愿再在巴黎生活。向往多年的巴黎生活，给他留下的回忆并不美妙。因此他想寻找一块地方，能使他感到安定，感到自由，并且不会受到专制暴政的打扰。

路易十五对伏尔泰采取这样的态度，其实是一个失策。伏尔泰是一个影响极大的人物，有人说伏尔泰的逃亡是王室与文人分裂的标志，这样说是有道理的。路易十四优待文人，实际上就等于软禁了他们；而路易十五轻视文人，也就等于是解除了他们的束缚。因为文人是可以制造和支配舆论的，而没有哪一个政府能够忽视舆论。伏尔泰的逃亡确是法国君主制衰败的象征。

伏尔泰在60岁以前，从没有过自己的房子，都是住在别人的房子里。由于伏尔泰是个善于经商的文人，他几十年来积攒了一大笔金钱，他要为自己买一

座房子，定居下来。经过反复思考，他选择了瑞士。瑞士是一个新教国家，伏尔泰天真地认为，那些宗教改革家是被别人虐待过来的，他们总不会再去虐待别人。同时，瑞士是一个共和国，在这里总不会再受到君主及其走狗的迫害。60岁的伏尔泰，于是在日内瓦定了居，这时是1754年。

伏尔泰和德尼夫人在日内瓦买了一座大房子。这个地方原来叫做圣·约翰庄，因为伏尔泰是反宗教的，不愿自己的房子顶上是个圣者的名字，因此改名为快乐园。伏尔泰同时又是个天主教徒，而旧教徒是不准在日内瓦置产的。因此伏尔泰借钱给德龙萝医生，让他买下这座房子，同时给伏尔泰一张终生租住契约作为借款的利息。这样，总是在漂泊动荡中生活的伏尔泰，终于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家。快乐园位于俯瞰雷曼湖的一块高地上，风景秀丽怡人，视野开阔，气候宜人，是一个居住生活的好地方，现在已成为伏尔泰的纪念馆。

伏尔泰在日内瓦的生活，令我们想到另一位法国启蒙时代的思想家卢梭。卢梭生于日内瓦，并且自豪地声称自己是“日内瓦公民”。当时卢梭听说伏尔泰定居日内瓦时，他十分高兴。尽管伏尔泰和卢梭的私人关系一直很不好，卢梭对伏尔泰还是非常崇敬。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伏尔泰不仅是最机智的人，也是社会中最和蔼可亲的人，倘若人们只考虑

他的智力的话，那就必须跪着度过一生。”卢梭还给伏尔泰送来了他刚刚出版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伏尔泰对卢梭的观点一向持不同意见。他以前读过卢梭的《论科学和艺术的复兴是否促进了风俗的淳化》，这是卢梭看到第戎科学院的征文广告后写的文章，并在征文中获奖。卢梭认为，文明的发展并不能促进人类和社会的进步。他以中国为例，证明他的“文明否定论”，中国古代科学和艺术都很发达，文明很进步，但文明进步并不能纠正中国人的恶习，也不能使中国免遭异邦的侵略和征服。在中国，文艺是受人尊崇的，如果科学和艺术能够淳化风俗的话，文明的进步就应该能鼓舞中国人的勇气和斗志，中国人民就应该是聪明、自由而不可征服的。可是事实是，中国众多的文人学士并未给中国的进步与发达带来什么帮助，中国仍旧遭受异族的统治。

伏尔泰收到卢梭寄来的第二本书后，给卢梭回了一封信，信中没有提及对卢梭这本著作的看法，而是和卢梭讨论了他的第一本书的内容，指出反对卢梭文中所谓的文明否定论及原始主义，并且说不愿意像动物那样用四条腿走路。他还说，大的罪恶都是著名的无知之徒犯下的。

卢梭收到信后立即给伏尔泰一封回信，信中提出，如果一个作家的作品不是为了反对政府的腐败，反对

恶行而写，那么他就没有必要去写了。如果他不曾读书或写字，也许会比现在生活幸福。他还写道：“人类的一切罪恶都是来自错误而不是来自无知，一无所知对我们的伤害要少于自以为知。”

由于伏尔泰和卢梭有着完全不同的观点，而卢梭在文中以中国为例证明自己的文明否定论，因此伏尔泰对中国的文化和历史产生了研究的兴趣，并且把中国的哲学和伦理道德作为启蒙运动的有力武器。他选择的着眼点是中国古代悲剧《赵氏孤儿大报仇》。

《赵氏孤儿大报仇》，或称《赵氏孤儿》，是中国元朝剧作家纪君祥作的杂剧，其取材于《史记·赵世家》。大概内容是：春秋战国时期，晋国权臣屠岸贾残杀赵盾一家，并搜寻赵氏孤儿赵武，想要斩草除根。赵家门客程婴与公孙杵定计救出赵武，并由程婴将孤儿养大成人，最后报仇雪冤。

伏尔泰在一些书上看到译成法文的《赵氏孤儿》，觉得很受启发，决定以这部元剧为原本，写一部悲剧《中国孤儿》。但中国元代杂剧的原剧情十分复杂，不易改写，并且缺乏恋爱情节，这样的悲剧在欧洲剧坛恐怕不会受欢迎。因此，伏尔泰对原剧大加删改，使之符合欧洲戏剧的审美观。改编后的悲剧《中国孤儿》的大致情节是：成吉思汗率领鞑靼军队灭金之后，侵入中国，占领了中国黄河以北的地区。他回到北京，

发现他所心爱的女人依达姆嫁给了一个高官盛悌。盛悌曾从入侵者手中救出王室最小的王子免遭侵略者的杀害。成吉思汗让依达姆作出选择，要么与丈夫离婚嫁给他，要么与丈夫及那孤儿一起被处死。依达姆和盛悌宁死不屈。最后成吉思汗被他们所感动，放了他们及那个孤儿。

伏尔泰的《中国孤儿》虽然是从中国戏剧改编而成，其实与中国原剧已有极大的不同。他把故事的背景从公元前五世纪的春秋战国时期，往后推移到1700多年后的元朝，又把一个诸侯国家内部的文武不和的故事，改编为两个民族之间的文野之争。在艺术上，他按照“三一律”的戏剧法则，把剧情的时间从20多年缩短到一昼夜，删掉原剧中的弄权、作难、搜孤、除奸、报仇等情节，突出托孤、救孤两个情节，再加进去一个爱情故事，就布局成了一部标准的古典主义五幕悲剧《中国孤儿》。

伏尔泰一生中对戏剧的热爱都非常浓厚，并且创作过不少很成功的戏剧。这次改编的《中国孤儿》，也如他所希望的那样，获得很大的成功。这种把中国的戏剧故事搬上法国舞台的作法，在伏尔泰之前的中法文化交流史上，还没有发生过。伏尔泰改编的成功，激发了不少英法等国家的戏剧艺术家们对中国戏剧的兴趣，随即，有更多的中国戏剧被引入欧洲，改编成

欧洲式的戏剧。伏尔泰也因这次的改编的成功而获得更高的声誉。当时的《爱丁堡评论》曾写道：“伏尔泰先生也许是法国最有名望、最有才华的作家……在他最近的悲剧《中国孤儿》里，他的创作天才尤为突出。我们读了这部作品，一方面觉得高兴，一方面又觉得奇怪，因为他把中国道德的严肃与鞑靼野蛮的粗犷一齐搬上了法国舞台，而同时与法国人最讲究的严谨细致的种种规矩毫无抵触之处。”

《中国孤儿》改编的成功，使伏尔泰从事戏剧的热情更加浓厚。专门在快乐园建造了一个小剧场，排演自己的剧作。每当新戏上演时，周围的群众就会蜂涌而至，快乐园里热闹非凡，伏尔泰为此而感到兴奋。但那时，日内瓦是禁止戏剧娱乐的，伏尔泰的行为违反了政府的规定，当局便发出禁令，严禁日内瓦居民到快乐园看戏，并勒令伏尔泰停止戏剧活动。伏尔泰不甘示弱，与日内瓦政府进行了一系列的斗争。

正当这时，另一位启蒙思想家达兰贝尔来到快乐园，向伏尔泰请教《百科全书》中关于“日内瓦”条目的撰写问题。伏尔泰便建议达兰贝尔在辞条中写上要求在日内瓦建立公共剧场的内容，达兰贝尔遵照伏尔泰的授意写下了这一条目。关于这个问题，也涉及到各个启蒙思想家之间的分歧。卢梭反对这一内容，便写了一篇名为《达兰贝尔谈戏剧书》的文章，批驳

达兰贝尔的观点。伏尔泰因此与卢梭展开辩论，卢梭又用《中国孤儿》一剧攻击伏尔泰。于是，在当时就开了一场针对社会实质性问题的，遍及整个法国的大论战。

卢梭认为，“自然状态”下原始的，未开化的人，是善良的、高尚的、纯粹的。在自然状态之下，没有工业、农业，没有法律，没有私有财产和私有观念，没有战争、奴役与统治，天赋人权给人们的广泛的平等和自由，人在自然面前具有自由主动者的资格。这种自然状态下的人，在与自然进行斗争，保护自己的过程中，不断完善自己，在斗争中增长了才智，发明了工具，引起了社会革命，私有制随之产生，“自然状态”结束，而“社会状态”取而代之。于是，人类天赋的自由、平等与和平都消失了，人与人之间产生了妒嫉、谋害、欺诈等恶劣行为，为使个人欲望得到满足，产生了无数的社会邪恶。因此，卢梭主张“生活简单化，回到自然去。”

这种观点与伏尔泰的观点是完全相背的。伏尔泰认为，卢梭所描述的“自然状态”，其意在于寻求人的纯粹的自然本性，并借以论证当时法国的封建专制统治并不是永恒的自然规律，而是违背人的自然本性的。他的“回到自然去”也并不是真的要恢复到原始的自然状态，而只是要借此激起人们对现实专制制

度的憎恨，唤起人们对自由和平等的向往，以便动员人们为建立一个符合自由和平等原则的社会而斗争。这不仅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而且从理论上也非常成功地运用了否定之否定的矛盾辩证法。伏尔泰对卢梭的观点进行了深刻的精辟的分析，但同时又尖锐地指出，卢梭把“自然状态”和“社会状态”完全绝对地对立起来，美化前者而谴责后者，把“自然状态”美化为体现完善人性的人类黄金时代，这是反历史主义的，是历史的倒退。卢梭把产生社会恶习的一切罪恶都强加于科学、艺术和文明的头上，说什么科学和艺术日益进步，可是人变的愈来愈坏了；辨别善恶的树长大了，可生命之树却枯萎了；人的自我完善化能力正是人类一切不幸的源泉，这都是十分错误的。伏尔泰对这些错误论点进行了无情的批驳。他认为文明是应当提倡的，他歌颂理性，推崇文明，强调科学技术、文化艺术和社会生产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历史的进步。他还把卢梭和教会神父相提并论，一概斥之为“可怜虫”。这下子可引起了日内瓦当局的严重不满。再加上他在文章中称赞新教的牧师既不相信《圣经》，又不相信地狱，只是与他一样的自然神论者，这样的称赞可是牧师们谁都不愿接受的。他又说宗教改革家加尔文的心是“残酷的”，更加令人不快。虽则他写信给印刷所，争辩他原稿上写的是“严峻的”，被误印

为“残酷的”，这种申辩方式是他惯用的伎俩。但事情最终演变的结果，是日内瓦当局的蛮横干涉。这下子，快乐园可不再是乐园了。他说：“我极爱自由的人民，但我更爱我个人的自由。”

既然法国和瑞士都不能使他得到安宁，伏尔泰便觉得，最好站在两国中间，一只脚伸在瑞士，一只脚伸在法国，或者干脆就有四只脚。在瑞士内瓦湖畔有两座宅邸，在两国边界上再有两座，那么一旦哪边有什么风险，就可以立即逃跑，等待风声平息。刚好这时在靠近日内瓦的法国边境有两块田地出售，一处是多奈伯爵的封地，连着一切贵族的特权出让，还有一处是法尔奈庄园。伏尔泰这时早攒下大笔的财产，他把两处产业同时买下了。这样，他的三窟就布置起来了。“我左脚踏在于拉峰上，右脚踏在阿尔卑斯山巅，阵地的前面是日内瓦湖。一座美丽的宫殿在法国边境，一座隐居的精舍在日内瓦，一个舒适的住宅在洛桑，从这一窟到那一窟，我终于幸免君王及其军队的搜索了吧！”这位老人在安排好这一切后，终于满足地感叹了。

十五 卡拉事件

伏尔泰从很早的时候就开始反对宗教、反对教会，反对宗教狂热、宗教迫害。他几乎是多年来教会最难对付的敌手。伏尔泰不仅在言词上反对宗教狂热，而且在行动上坚决抵抗；不仅自己站起来抵制宗教狂热，而且号召一切社会进步力量同宗教作斗争。伏尔泰是教会不共戴天的仇敌。在伏尔泰看来，基督教就是建立在“最下流的无赖编造出来的最卑鄙的谎话”的基础上，是“最卑鄙的混蛋作出的各种最卑鄙的欺骗”的产物。宗教迷信和教会统治是人类理性的大敌，蒙昧主义是一切社会罪恶的根源。他认为，全部教会史是充满迫害、抢劫、谋杀等罪行的历史，是教会僧侣煽动宗教狂热和宗教偏见的罪恶史。他说：“自从圣处女的儿子死后，恐怕没有一天没有人不因他而被杀。”的确，在基督教产生之后，千百万人遭到宗教的迫害死亡或流离失所。伏尔泰对这些人充满同情。他运用各种方式与教会和宗教狂热作斗争，用他手中的笔，向人民灌输对教会和宗教偏见的仇恨，宣扬理性、科学、信仰自由和宗教宽容思想，在启蒙运动中发挥了巨大的战斗作用。他还利用现实事件，抓住正

在发生的宗教罪恶，揭露宗教的反动性，抨击教会和僧侣的罪行，平反冤案，解救那些受到宗教迫害的人们。

1761年11月13日，在土鲁斯城，发生了一件骇人听闻的宗教迫害事件。一家绸布店的店主让·卡拉，是一位胡格诺教徒。他为人和善、宽容，有六个子女，均已成年。大儿子叫马克·安东尼。卡拉夫人出身在贵族，颇善于治家及教养子女。马克·安东尼这年29岁，性情抑郁。这一天，家里来了一位客人，是一位天主教徒，曾劝说马克·安东尼和弟弟皮埃尔改信天主教。卡拉一家热情招待客人，没有发现儿子的异常表现。马克·安东尼在大家都在吃饭时，独自到了厨房。女仆让娜对于他的突然出现很感惊讶，询问他出了什么事，是否受了凉，要不要来烤烤火。马克·安东尼只说了一句“我热死了”，便离开了厨房。

饭后，卡拉夫人让皮埃尔下楼送客。皮埃尔走到楼下，惊奇地发现门敞开着。他预感到发生了什么事，便点上蜡烛。烛光下，眼前的景象令他惊呆了：安东尼吊在门框上。他的惊呼把全家人都引了过来。大家一齐放下安东尼，并请来了医生。但是一切都无济于事，安东尼已经死了。

卡拉一家开始还以为儿子是被谋杀的，及至他们

确信是自杀时，所想到的就是要瞒住安东尼自杀这件事。因为天主教的教义是不允许自杀的。但是，这时已有不少人闻讯赶来。大家议论纷纷。有人说是让·卡拉杀死了自己的儿子，因为安东尼改信了天主教。其实这种流言是毫无根据、毫无道理的，然而却被教会当成了真情。因为有的狂热的天主教徒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诬蔑说，马克·安东尼是被他的父母杀死的，因为他最近改信了天主教，明天就要声明脱离胡格诺教，而按照胡格诺教的传统，做家长的宁愿置儿子于死地，也不愿他改教。这种说法如此荒谬，然而听起来却象真的一样。于是警察被召来，逮捕了卡拉一家及他的客人。

其实胡格诺教并没有禁止改教的规定和传统，并且熟悉卡拉一家的人都知道，让·卡拉是一个慈爱、宽容的父亲，对子女的信仰并不加以干涉。就在这件事发生不久前，他们的一个儿子因受女仆让娜的劝说，改信了天主教，让·卡拉也并没有加以责备，甚至仍旧将女仆让娜留在家中。信仰天主教的女仆让娜也为主人辩护，一个老人怎么能制服一个年富力强的青年而把他缢死呢？要么就得这样推论，全家人，包括来访的客人，都是共谋杀害马克·安东尼的凶手。但这怎么可能呢？父母兄弟联合起来谋害一个嫡亲的骨肉，谁能置信呢？就连安东尼死前要改教的说法，也

是没有证据的。

但就是这样荒谬的事情，被教会拿来当作耀武扬威的事例。他把马克·安东尼宣布为神圣的殉道者，并且将尸体抬到教堂，念念有词地说，神灵将使尸体复活。这当然是自欺欺人。天主教是禁止自杀的，可这个违反天主教禁令而自杀的人，却得到教会的百般推崇。人们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教会为真正的殉道者举行的仪式都没有这么壮观，教堂中悬挂着一副向外科医生借来的骷髅，一只手握着棕榈叶，这是殉道的标志；另一只手握着据说是他签署放弃异端声明的那支笔，作为他被谋杀的证据。

案件被提交土鲁斯高级法院审理。检查官迪库觉得，一个头发花白、年近古稀的老人卡拉，怎么能吊死一年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呢？于是他勇敢地出庭，为卡拉辩护。可他却被宣布停职三个月。律师续德尔陈述了事实真相，却被法官斥为无能。案子落到这样一位狂妄好事的法官手里，卡拉一家全被拘禁起来，法院一不容申辩，二不作现场调查，最后的八票对五票通过，父亲被判处车裂的死刑，儿子皮埃尔被判充军，其他的人被宣告无罪。这样的判决真是残酷而又荒谬，因为要么是全家人共谋，都应判有罪，要么是全家人都是无辜。卡拉老人从始至终也未承认自己有罪，当法官询问他与何人共谋的时候，他老是回答说：“唉，

既然没有犯罪，哪里来的共谋？”

1762年3月11日，善良的老卡拉在土鲁斯广场被车裂处死。在临刑前，卡拉对他身旁的神父说：“我无辜而死，耶稣基督简直是无辜的代名词，他自愿受比我更残酷的极刑。我对我的生命毫无遗憾，因为我希望这场结局会引我去享受永恒的幸福。我哀怜我的妻与子，但对于那个我为了礼貌而留他晚餐的客人，我尤其觉得遗憾。在场的旧教教士们都相信他是无辜的，说他虽然是新教徒，但他的死与殉道者的受难完全一样。

伏尔泰刚刚听到这个故事时，以为卡拉真的杀死了自己的儿子，不由地痛恨这个胡格诺教徒，认为他比亚伯拉罕还要坏，因为亚伯拉罕是奉神之命准备杀死自己的儿子，而卡拉是主动这么做的。他认为这是一个宗教狂热的典型事例，留心着这件事的发展。可是随着他得知的消息越来越多，他也越发地对整件事情发生疑问。无论是卡拉杀死自己的儿子，还是法院对卡拉的判决有误，最终得出的结论，这都是宗教狂热的可怕后果。于是，伏尔泰决定弄清事实真相，为无辜的人伸张正义。他在给达兰贝尔的信中说：“为了热爱上帝，请您尽可能做出准确的判断，究竟是狂热引导一个父亲吊死了自己的儿子，还是狂热使八个法官把一个无辜处于车刑。”

伏尔泰经过多方调查，了解到让·卡拉是无辜的。马克·安东尼改信天主教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那不过是天主教的狂热分子捏造的莫须有的罪行。60多岁的老人根本无法吊死年轻力壮的儿子，并且父亲决没有干涉子女的信仰问题。马克·安东尼自杀的真正原因是选择职业上的烦恼。让·卡拉是无辜的，这样的悲剧之所以发生，是宗教和法律制度的缺陷造成的，一方面是法官的宗教狂热，一方面是秘密审判，这两个方面的错误导致了卡拉无辜的死亡。

伏尔泰一旦了解了真相，就意识到，自己没有权力沉默，他必须站出来为无辜伸冤。因此他一面救助让·卡拉的遗属，一面利用自己的地位、关系、金钱以及自己手中的笔，与他愤恨的宗教狂热进行斗争。卡拉的两个儿子逃到了瑞士，女儿被送进了修道院，只有卡拉夫人一人“孤零零地留在广袤的世界上，没有面包，没有希望，悲惨的结局使她极度忧郁”。有人劝她去巴黎向国王申诉，而这个可怜的女人的父母当初正是因为宗教信仰而从巴黎逃走，在她的想象中，巴黎比土鲁斯人还要可怕。但是为丈夫报仇的责任使她克服了恐惧。她去往巴黎，一路上饥寒交迫，到达巴黎时，她几乎要死了。幸运的是，她在那里得到了伏尔泰朋友的同情和帮助。

伏尔泰开始发起为卡拉昭雪的活动。他给许多地

位较高的朋友写信，表明自己的态度和希望，以获得他们对他的支持。他组织了一个辩护委员会，其中包括巴黎高等法院最著名的律师。卡拉夫人还得到法国各界人士和欧洲许多国家有识之士的同情和支持。这正是伏尔泰所希望的：“在法庭判决之前很久，公共舆论已经对这个案件做出判决。”

在其后的4年中，伏尔泰放下手中的其他工作，将为卡拉一家伸冤当作他的一件大事。他说动了旭阿素公爵、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和凯塞琳女皇为之声援。1763年2月3日，伏尔泰亲自写了上诉状，作出“我敢肯定这一家人无辜”的结论，并坚决要求当地议会和法国最高法院重新审讯。为了这件工作，伏尔泰花费了很多的心机。他认为，为卡拉进行的辩护不应搞成对土鲁斯法官的控诉，不要指责土鲁斯的法官，只能说他们是执行法律，卡拉被判有罪，而证据却不充分确凿。虽然法官有很大责任，但这样做就可以避免直接与法官对抗，比较易于与巴黎高等法院结成统一战线。但事实上，虽然伏尔泰想的很周到，却是不可能做到的。因为卡拉案推翻就等于是公开指责土鲁斯法院的法官。因此，伏尔泰的这项工作很难进行，有些狂热教徒甚至主张，与其让八位法官承认错误，修改判决，不如宁可车裂一个无辜的加尔文教徒。另外更有甚者，有人提出，因为法官人数多于卡

拉一家的人数，因而卡拉一家应当为保全法官的荣誉而牺牲。对此，伏尔泰愤怒地指出：“他们有没有想过，法官的荣誉和别人一样，在于补救自己的过失。”

伏尔泰下定决心，至死不放弃为卡拉伸冤的事业。在伏尔泰和其他一些思想家们的努力下，巴黎高等法院终于复审了卡拉案件。1763年3月7日，凡尔塞宫举行国务会议，全体大臣出席了会议，一个法官以公正的态度作了卡拉案件的报告，会议最后作出决议；对土鲁斯法院提出抗诉，责令它呈送审判过程的全部文件，并且要说明判处让·卡拉的理由。国王表示赞同这一决议。

在为卡拉一家申冤报仇而四处活动的同时，伏尔泰也在进行《论宽容》的写作。在这部著作中，他概括了对卡拉事件的看法，阐述了他的宽容思想。伏尔泰不仅批评天主教的狂热分子，而且批判宗教狂热。他明白指出，这部著作中的原则同样适用于新教徒，他们也应该遵行理性和良心。《论宽容》的出版引起反动分子的强烈不满。伏尔泰的一位朋友给他写信，称赞这部著作充满仁慈和真理，但是担心它会激怒土鲁斯高级法院的法官，这些法官会要求高等法院下令烧毁它，他们会用偏见的叫嚣对抗理性的呼声。伏尔泰回信表示，他对土鲁斯法院法官的迫害毫不在乎，宣称每个人都有自由在自己的房子里烧掉不喜欢的书，

并相信会有许多明智的读者，用它来反对狂热分子的作为。

经过几年的努力，伏尔泰的斗争终于取得了满意的结果。1764年，巴黎高等法院撤销了对卡拉的判决，1765年3月11日，即老卡拉被车裂惨死的三周年纪念日，枢密院正式宣布为卡拉一家完全恢复名誉。法国国王赐予卡拉夫人316万金币作为抚恤金，卡拉一家人得到了自由。伏尔泰为给卡拉昭雪而做的巨大而长期的努力，得到大家的承认和接受。整个欧洲被伏尔泰的行为所震动，人们称他是“卡拉的恩人”。

30年后，国民大会下令在“狂妄迷信害死卡拉的”广场上建立一座白石纪念碑，上面镌刻着这样的词语：“国民大会奉献于父爱，奉献于自然，奉献于狂妄迷信的牺牲者卡拉。”费用由国库拨出。

十六 拉·拜尔事件

卡拉事件发生后不久，在法国又发生了另一件因宗教狂热而起的冤案。在比加地省一个名叫亚倍维尔的小城中，有一个可爱的品行端正的女修院主。城里有一个叫做倍尔华的居民，当时已经60岁，是当地小法庭里的警官。他追求修院主，被她婉言拒绝了。

这位倍尔华警官对这件事怀恨在心。1764年的一天，女修院主的一个19岁的侄子、骑士拉·拜尔来和她一起生活。他住在修道院外，但常和几个朋友到修道院里用晚餐。倍尔华警官对此十分嫉妒和愤恨。他听说年青的骑士拉·拜尔和他的一个朋友戴特龙德，在一次宗教仪仗出巡时不曾脱帽，便想把这件失礼的事编织成一件故意侮辱宗教的罪案。几天之后的一个早晨，亚倍维尔桥上的一座木十字架损毁了，可能是被路过的小车撞坏的。但有人定要把这件小事认为是故意的捣毁，以此表示侮辱宗教。恰好这时亚米安城的主教到这里来举行庄严的出巡典礼，一时间闹的沸沸扬扬。

倍尔华警官看到了自己复仇的机会。他费尽心机，要把木十字架的倒塌与宗教仪仗出巡的两件事情混在

一起。他开始调查拉·拜尔的经历和品质。他获得一张控告他的召唤状，把一封主教的信在布道时公开宣读，要求忠实信徒供给证据，如果有所隐瞒，就将被开除教籍。这是一件极为危险的事，因为公开宣布的嫌疑案一定会成为伪证。就是有那么一些恶人与疯子，随时伺机出来咬别人。当时就有一个证人说拉·拜尔唱过淫邪曲，另外一个则发誓说拉·拜尔在讲起圣·玛丽·玛特兰时用过褻渎的字眼。可是亚倍维尔的法官简直是残暴到不可思议。他们判处骑士拉·拜尔先行梟首再行火刑。骑士拉·拜尔被押送到巴黎。检察长觉得此案有些蹊跷，有些不合逻辑，想要撤销亚倍维尔的原判，但25个法官中15个赞成维持原判。这一次的判决，令整个法兰西的人民都为之痛心疾首。拉·拜尔又被押回亚倍维尔，接受自己判决的执行。死刑即将执行时，在场的陶米尼派教士看见拉·拜尔的痛苦，也为之难过的食不下咽。拉·拜尔对他说：“吃一些东西吧，你和我需要同等的精力，才能支持我主演的场面。”他受刑之前的遗言只是：“我不相信人们会只因为这么一些小事而处死一个年轻的绅士。”伏尔泰得知这件事情后，内心十分地恼怒。决定致力于为骑士拉·拜尔平冤的工作中去。他怒骂反动教会竟是如此残忍，痛斥上帝的子孙还不如禽兽。他大声疾呼，为在宗教狂热下牺牲的拉·拜尔辩护。伏尔泰

为此专门写了文章《记拉·拜尔骑士之死》，指责法国司法制度为宗教狂热分子服务。在卡拉事件发生之后，伏尔泰曾经以为，在法国的外省存在着野蛮行径的痕迹，但在首都巴黎，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但是，对骑士拉·拜尔的判决，不仅得到巴黎高等法院的批准，而且国王本人对此也表示同意。正因为法院的判决是路易十五批准的，伏尔泰为拉·拜尔昭雪的努力没能取得成功。

伏尔泰籍此愤怒地写道：“这些小花脸！是吃人者！……你们从跳舞的篝火场边和从演滑稽歌剧的格甫广场赶来；车裂卡拉，烧死这可怜的青年，你们把无辜青年的不幸忘在脑后，我简直不愿意和你们呼吸同一种空气。”

惯于嘲笑、戏弄和讥讽的伏尔泰，在杀人凶手面前，在一桩桩血淋淋的事实面前，变得沉默深沉了。他觉得，现在最需要做的事，是要启迪民众，让人民自觉地起来同愚昧的宗教习俗作斗争。而这就需要运用他手中力量无穷的笔，对反动教会进行严厉的打击。他的这一武器，就是整理和发表梅叶的《遗书》。

让·梅叶，是法国天主教会的一个乡村教士。他生活在农村中，目睹农民遭受的种种苦难，开始认识到自己向他们宣传的那些教义，全是欺骗人类正常理智的胡言乱语。于是，他便运用自己的知识和智慧，

秘密进行着暴露教会内幕的工作，并且经常对教会表现出不敬行为，和大主教也因此而发生冲突。但他一直没有勇气向人民公开来承认自己在讲坛上的说教全是骗人的谎话，因而感到万分痛苦。这导致了他于1729年绝食自杀，自杀前，他写下了一部遗书，指望在自己死后人民能认清教会的真相。这部《遗书》由伏尔泰整理和出版，令世界舆论为之震惊。

在《遗书》中，梅叶写道：“当我因向你们传道而说谎时，我的内心是多么痛苦啊！你们的轻信引起我心中多少悔恨。千百次我准备当众忏悔，但是我力不能胜的恐惧心理阻挡了我，使我不得不缄默下来，直到我的死亡。”“我从不轻信，更不肯迷信，我从来没有愚到认为宗教的神秘和狂妄有任何意义。”他虽然担任神职工作，但是他内心非常痛恨这个荒谬的职务，自认为完全是在做违反他本意的事。梅叶认为，宗教“是世间无数滥用职权行为和残暴行为的原因和根源，也是暴政本身的原因和根源。暴政使民间这么多的人民在痛苦地呻吟着，而外表堂皇、内容虚伪得令人可恨的宗教竟胆敢为暴政打掩护”。宗教也是人们“所有一切祸害、苦难、忧愁和灾殃的决定性的原因”。只要不彻底批判宗教，人们就不能从暴政解放出来。梅叶认为，世界上穷人的各种迷信及偶像崇拜的欺骗时间已经够长的了，富人对穷人的掠夺和压迫

的时间也已够长的了，现在该是打开穷人的眼界，向他们宣传全部真相的时候了。所以他在《遗书》中揭露了宗教的虚伪性和苦难性，同时也批判了宗教为封建专制服务的反动性。他在《遗书》的序言中说：“我的目的，是要尽我的力量使你们睁开眼睛(虽然晚了一点)，看看我们所有的人(我们有多少人啊)不幸的诞生和生活在其中的那些荒唐的谬误。”伏尔泰为骑士拉·拜尔冤案的平反工作斗争了十多年，没能取得成功。在这同时及其后，他一直关心冤狱，为受冤屈的无辜的人伸张正义。伏尔泰的这些活动和斗争给他带来了极高的声誉，法国各地经常有人写信或登门向他求助。法尔奈成为欧洲舆论的中心。法国人民自愿捐款，由国内最优秀的雕塑家为他塑了一座像，人们尊称他为“法尔奈教长”。路易十五再也无法阻止伏尔泰的斗争了。

十七 天真汉

在伏尔泰购买法尔奈之前，这里是十分落后的。人民生活极为困苦。伏尔泰来到这里做主人之后，对农民的悲惨状况十分忧虑，立即想办法改善他们的生活。他在自己的别墅周围建立工业村，投资兴办工厂，请来有技术的工人，建立缫丝和制装工厂。为了这项事业，他不惜牺牲自己的演戏嗜好。他的剧院成了车间和养殖场。他把这项事业经营的很成功，许多朋友都高度赞扬他的这项成就。有人称他是“欧洲的孔夫子”。弗里德里希则真诚地说：“照耀世界的光明来自瑞士的一座名叫法尔奈的村庄。”

伏尔泰在法尔奈的生活过的很舒心。有德尼夫人陪伴，有大量的金钱、众多的仆人和崇高的声誉。但在他愉快的生活之中，也不时地会发生一些令人不快的事情。与拉阿尔普的关系，就是这些事情中的一件。

拉阿尔普是法国一位小有名气的作家。1772年，当伏尔泰的朋友蒂埃里奥去世后，邀请拉阿尔普担任他在巴黎的代理人和与弗里德里希联系的中间人。拉阿尔普与伏尔泰已相识几年，并曾带着新娘来过法尔奈访问。伏尔泰对他们非常热情，并且非常欣

赏阿尔普的妻子。她是演员出身，美丽迷人，随时可以在需要的时候流泪。拉阿尔普称伏尔泰为“伟人爸爸”，伏尔泰则称他们是“小孩子”。他们之间关系亲密无间，相互尊敬，常常在一起争论问题或修改诗作。

但就在他们和平愉快的共同生活中，事情发生了变化。德尼夫人对拉阿尔普十分欣赏，把拉阿尔普视为知己，经常对他讲心里话。法尔奈是个小村庄，虽然这里的生活很是舒适，但德尼夫人过惯了都市繁华的生活，常常向往都市生活。她向拉阿尔普倾吐自己的心曲，拉阿尔普对她充满同情，不久便成为他的情夫。伏尔泰本来并没有注意这件事情的发展。他把他的作品《日内瓦内战》和《回忆录》等的手稿交给德尼夫人保管。而德尼夫人把《日内瓦内战》的手稿交给了拉阿尔普。后来伏尔泰对德尼夫人和拉阿尔普的关系起了疑心，常常斥责她过分地袒护拉阿尔普。拉阿尔普离开法尔奈，前往巴黎，带走了《日内瓦内战》的手稿。不久，这部作品便在巴黎流传开来。其中有一些内容，对伏尔泰很不利。伏尔泰得知这一消息，十分生气。拉阿尔普回来后，伏尔泰指责他偷窃，拉阿尔普解释说，他是从巴黎一位雕塑家那儿得到的。伏尔泰经过调查，证明拉阿尔普是在说谎。

因为这件事，伏尔泰和德尼夫人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德尼夫人威胁伏尔泰说她将离开法尔奈，去

往巴黎。伏尔泰认为她并不是当真。但第二天，德尼夫人真的和拉阿尔普夫妇一起离开了。伏尔泰非常气愤而失望。没有德尼夫人，他独自在法尔奈的生活非常烦闷孤单。他先是对德尼夫人的出走大发雷霆，过后又发觉自己对她的需要，向友人表示原谅她，请友人帮助他劝她回来。

德尼夫人出走几个星期后，伏尔泰领了一次圣餐。他的这一举动像往常一样，立即引起小小的轰动。他的敌人指责他虚伪，他的朋友则怀疑他在哲学立场上有所动摇。而伏尔泰在给朋友的信中说，他这样做没有任何特别的意义，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倘若住在拉·拜尔骑士的村子，他每两个星期都会领一次圣餐。他还说：“为了不被狼吃掉，我将和狼一起嚎叫。”

这一时期，也是伏尔泰哲理小说的多产时期。他于1767年完成了中篇哲理小说《天真汉》。这部小说的主题是反对教会的。它的大意是：天真汉是个在加拿大原始部落中长大的法国人，在原始社会中，他养成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天真习惯，长大以后回到法国，住在叔父家中。天真汉年轻漂亮，身体健壮、头脑聪明清晰、心地善良，习惯于从事物的本质对事物进行观察和评价。他觉得法国的很多东西都是不可理解的、荒谬的。自从他改信基督教后，与基督教发生了一连串的冲突。

天真汉与圣·伊佛小姐相爱，圣·伊佛小姐是圣·伊佛神父的妹妹，也是天真汉的教母。天真汉希望与圣·伊佛小姐结婚，圣·伊佛小姐也愿意嫁给他，但需要双方家长同意。天真汉觉得不可理解，他说：“我想吃饭、打赌、睡觉的时候，从来不跟别人商量。我知道为了爱情，不妨征求对方的意见。但我决不会爱上我的叔父，也不爱我的姑母，当然不用去请教他们。”

天真汉的叔父对天真汉向自己的教母求爱的事十分恼火，说：“这是不可能的，她是你的教母，教母同教子握手就犯了天大的罪孽，更不要提结婚了，那是教内教外的法律都禁止的。”天真汉感到非常气愤。他为了能和圣·伊佛小姐结婚，宁可宣布洗礼作废。

由于天真汉和圣·伊佛小姐的爱情违反了宗教习俗，受到了教会、法官的干预。圣·伊佛小姐被送到修道院，天真汉和自己的心上人被隔离开了。

后来，天真汉在同入侵的英国人作战时，立下了大功，并且拾到英军失落的一个装满钱币的荷包。于是他便前往凡尔塞宫，准备去接受赏赐。他想，这样也许能得到允许自己与圣·伊佛小姐结婚的特许状。一路上，他看到人们到处出逃，满腹牢骚，都是因宗教迫害而流离失所的人。天真汉和他们一起议论教会，为5万个逃亡的家庭叫屈。他的议论被教会的便衣特

务听到了。天真汉刚到凡尔塞，便被公安大队的骑兵抓走，投进了巴士底狱。

和天真汉住同一间牢房的人，是一个不同教派的修士，只因认为教皇不过是个主教，就在黑暗的牢房中受了多年的苦，而且毫无重见天日的希望。天真汉对这位老修士说：“我认为我命里只有恶魔捣乱。美洲人的同乡永远不会对我这样野蛮。人家叫他们野蛮人，其实他们是粗鲁的好人，而这里的人，倒的确是些文明的恶棍。”

天真汉的叔父想通过教会的门路救出天真汉，四处奔波求救，但在腐败的教会机构面前处处碰壁，无可奈何。圣·伊佛小姐从修道院出来，得知天真汉被关在监狱里，便打定主意要解救他。她来到凡尔塞宫去找国王的秘书，这位秘书对她说：“我没有力量做什么好事，我所有的权力只限于偶尔做几桩恶事。”

圣·伊佛小姐又找一位很有权力的圣·潘安越先生。这位先生看到她长相美丽，便对她说，只要她能献出她的贞节，就可撤回密诏，救出她心爱的人。

圣·伊佛小姐很矛盾，不知如何是好。她去请教万事灵神父，神父对她说，倘若用意纯洁，行动不称其为罪恶，世上没有一件事比救出心上人更纯洁了。他还对她说，潘安越先生是个诚实君子，说出的话决不会食言。圣·伊佛向一位女友求救，这位女友却更

露骨地说，在宫廷中，这种事情是必不可少的，从最低微到最重要的职位，都是要付出代价的。妻子最漂亮，丈夫才有官做。如果圣·伊佛小姐为救心上人而失身，人们会认为她德行超群，会因此而为她喝采。

在周围布满的陷阱中，圣·伊佛小姐悲愤地喊道：“什么德行啊，德行，想不到患难之中只有把我玷污的人才能帮助我。”她为了拯救心上人，做出了最可怕的事情，屈服于潘安越大人的卑鄙要求，救出天真汉。但这件事带给她的痛苦使她无法忍受，她最后倒在痛苦得发狂的未婚夫——天真汉的怀里死去了。

天真汉痛苦、愤恨的浑身发抖，他想去杀死仇人后再自杀，但无奈行动受人监视而无法动手。后来天真汉成为一名优秀的军官，并被称为不屈不挠的哲学家。

伏尔泰在这部小说中，暴露了当时法国社会统治者的邪恶和人间的悲惨，封建专制统治和教会势力是制造黑暗的罪魁祸首，贵族阶级和大圣徒都是一些无恶不作的恶棍。然而他们的卑劣行径都是以愚昧人民为基础的，只有用理性主义教育人民，才能使人民摆脱愚昧，解脱苦难。在伏尔泰的笔下，天真汉的成长道路是以时代的文明精神启蒙教化的过程。而反动教会则是这种时代不共戴天的仇敌。

伏尔泰在这一时期中篇哲理小说的代表作，除了

《天真汉》外，还有《巴比伦公主》、《有四十个金币的人》等，这些作品的主题都是宣扬理性主义和启蒙思想，揭露法国封建专制暴政。法国宫廷对伏尔泰极为痛恨，可又拿他无可奈何。伏尔泰在法尔奈还插手日内瓦的政治纠纷，当他刚到日内瓦时，曾极力歌颂日内瓦的自由平等，后来他渐渐发现，在这个城市，政治制度和状况也并不理想，贵族有很大的势力，下层人民没有政治权利。伏尔泰对日内瓦的政治斗争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完成了他一生中最激进的论著。1768年完成的《日内瓦内战》、《甲乙丙对话录》、1769年完成的《巴黎高等法院史》、1770年出版的《关于百科全书问题》等，这些论著中，最重要的、最有影响、最有价值的思想有三个方面：第一，有关自由平等的观点；第二，对人民群众的看法；第三，有关资产阶级国家政体的思考。

十八 回到巴黎

伏尔泰的声望已经极高了。他不仅是法国文坛上首屈一指的巨匠，在欧洲舞台上也是第一流的大文豪，这是狄德罗、卢梭、达兰贝尔等人不曾享有的。人民群众热爱他，他们即使不知道他的作品，也要敬重他的年长；他获得后辈的宽容，因为明知他不久于世，也不再吝惜对他表示应有的崇拜；还有，他能恢复一个人天然的自由思想，因为知道自己距离最后的审判的日子不远了，因此对于世上的一切，即使不能常常保持坦白的判断力，即刻也能完全恢复。随着他年龄的增长，他成为欧洲知识界的元老。大家已不再当他是个人，而是个象征了。各国的君主，除了他本国的以外，认为他是思想界的权威。他的巴黎友人发起为他建造纪念像，四个国家的君主答应负担费用：俄罗斯女皇、普鲁士国王、波兰国王、丹麦女王。这件事使得伏尔泰非常高兴。他说：“我有了一手的王，但我应当胜这一局。这个荣辱交错，黑白相映的生涯，你不觉得敬佩吗？在我的四王之中没有一个南方之王，你不觉得遗憾吗？”

伏尔泰和弗里德里希关系破裂5年之后，两人又

重修旧好了。伏尔泰说：“这是情人的反目，宫廷中的纠纷过去了，但主要的美妙的情分历久常存。”两人一直保持着通信联系。弗里德里希致伏尔泰的诗如下：

魁人的民族，可爱的疯子，
空言和平而不想实行，
你们究竟要战争还是和平？
总应切实决定了吧。

伏尔泰致弗里德里希：

既然在战争与赋诗的艺术中，
你是一个那么伟大的大师，
既然你亦喜欢如此，
那么吟咏吧，嘶杀吧，
教育人群吧，劫掠世界吧，
我爱诗歌，我恨战争，
但我不反对你行军的凶焰，
我想，像你一样具有杀戮与
取悦的艺术是人人欢喜的。

弗里德里希最后说：“我们可不容易这么想。只

要人家厮杀下去，我总是奉陪的。你是流血惨剧的旁观者，你尽可在我们残杀的时候嘲弄我们。”由四国君主赞助的伏尔泰的肖像，由著名雕塑家皮加尔完成。皮加尔与伏尔泰一样，是古典主义的崇拜者。他为伏尔泰设计的是一座裸体坐像。伏尔泰晚年极为肖瘦，这使皮加尔的工作十分困难。但这座雕像终究是完成了。这是一位裸体的、半坐着的形销骨立的老人。伏尔泰对这座雕像比较满意。马尔蒂代尔为它献了一首诗，称赞皮加尔把伏尔泰塑造成一位反对无知、反对狂热哲学和狂热人类的健壮的运动员。除皮加尔外，还有两位优秀的雕塑家为伏尔泰塑过像。伏尔泰的声名已经提高了。

但他仍有个心愿没能实现，那就是回到巴黎。但是，只要路易十五还在世，伏尔泰的这个心愿就没法实现。

1774年5月10日，路易十五一命呜呼。路易十五得的是天花，是传染病，因此，他独自躺在凡尔塞宫二楼的寝室里，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新上台的路易十六，沉醉于荒淫娱乐，不理国政，法国内部一片混乱。因此，尽管路易十六和他的父亲一样恨伏尔泰，他已没有力量阻挡住伏尔泰的步伐了。伏尔泰之所以一直无法回到巴黎，就是因为路易十五下有禁止他回去的禁令。如今路易十五已去世了，伏

尔泰对于回到巴黎，又产生了信心。路易十六和他的父亲一样，禁止伏尔泰回到巴黎，并且下令，等伏尔泰死后，他的手稿全部没收，查封起来。因此，伏尔泰继续进行他的启蒙思想运动。同时，也鼓励其他启蒙思想家继续与封建专制与愚昧主义作斗争。伏尔泰曾是一个王权主义者，希望国家由一位开明君主来治理，反对教会干预国家政治事务，反对贵族享有特权。但当他看到他的开明君主制的理想已经无法实现时，他便开始转向支持共和制。他早已预见到革命即将发生。他曾说：“我所看见的一切，都在传播着革命的种子。革命的发生将不可避免。不过，我怕是沒有福气看到它了。”他逝世前一年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我们必须同自然和命运战斗到最后的时刻。在善之实现或死亡到来之前，我们绝不要对任何事物丧失信心。”

伏尔泰想回到巴黎的愿望终于有了实现的可能。巴黎不再拒绝伏尔泰了。1778年2月，84岁高龄的伏尔泰，在外甥女德尼夫人及维兰德侯爵的陪伴下，开始踏上回到巴黎的旅途。法尔奈的人民十分舍不得他，纷纷洒泪相送，伏尔泰也很难过，流下了眼泪。但不久，他就又兴奋起来。他的旅途十分顺利，因为所有的人都知道他，都尊敬他。他的到来轰动了巴黎。整个巴黎的人民出来迎接他，那样的仪式比一

国的君主到来还要热闹。

伏尔泰回到巴黎，除了是他多年的愿望，以及朋友对他的盼望和怂恿外，另一个主要原因是他要在巴黎公演他刚刚创作的悲剧《伊兰娜》。为了这出悲剧的顺利上演，伏尔泰认为他本人到巴黎去是必要的。

《伊兰娜》隆重上演了。剧场盛况空前，法国王后也来观看演出，伏尔泰本来想去观看首场演出，但因身体原因，未能实现。

几天后，当伏尔泰到剧院观看《伊兰娜》的演出时，剧场因为他的出现而沸腾了。演出结束后，演员们在舞台上抬出一座戴有王冠的伏尔泰大理石像，为他举行加桂冠的仪式，剧场里掌声雷动。人们护送伏尔泰回到他的住处，一路欢呼着：“伏尔泰万岁！”妇女们对他如此热情，以至伏尔泰开玩笑地说：“女士们，你们让我高兴得连命也要送掉了。”

伏尔泰回到巴黎，受到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其中他与美国驻法国的大使、著名科学家弗兰克林的交往，尤其值得一提。弗兰克林带着小孙子来拜访伏尔泰，他让小孙子跪在伏尔泰面前，请求他的祝福。伏尔泰向这个小孩子伸出双臂，祝福道：“上帝，自由，宽容。”在场的很多人，都被感动的热泪盈眶。弗兰克林与伏尔泰的会面，民主政治与理性主义的握手，已显出大革命的预兆来了。

伏尔泰回到巴黎，受到这样热烈而持久的欢迎，令他感到十分的快乐。但是，高龄、多病、体弱，这些问题困扰着伏尔泰。由于过分激动和劳累，再加上尿毒症发作，在指导演员排演《伊兰娜》时，吐了几口血。当时血从伏尔泰的嘴里和鼻子里猛烈喷射出来，在场的人都非常惊恐，以为这位老人要永远离开他们了。

幸运的是，不久，伏尔泰的身体又有了好转。他又兴致勃勃地进行各种活动，写诗，写信，但他做这些工作已感到力不从心了。他的病情逐渐严重起来，他的医生德龙芳劝伏尔泰回到法尔奈休养，德尼夫人和维莱特却不同意。后来德龙芳医生有事离开巴黎，他们二人更是紧瞒伏尔泰的病情，不向外界透露。当时巴黎有很多传言，总之是他的死期将近了。伏尔泰写信给德龙芳医生，请他立即赶回来。德尼夫人所关心的是伏尔泰的遗嘱。她怕伏尔泰取消她遗产继承人的资格，因此自己主动到法尔奈去找德龙芳医生。

教会也在关注着伏尔泰的生命。伏尔泰知道自己一生与教会作斗争，教会早已视他作眼中钉，只等待他的死亡。伏尔泰担心自己死后的命运会与他的朋友，勒库弗勒小姐那样被葬于荒野，便考虑与教会做一定的妥协。高尔蒂埃神父请伏尔泰写一份信仰声明，伏尔泰于是写道：

我由衷地崇敬上帝，热爱我的朋友，不恨我的敌人，憎恶迷信。

伏尔泰

1778年2月28日

高尔蒂埃神父对伏尔泰的这一声明觉得不满意，自己另外起草了一份，让伏尔泰签字，但遭到伏尔泰的拒绝。后来，3月2日，伏尔泰又重新写了信仰声明：

我死在我所生的那个天主教中，希望有上帝的怜悯，原谅我的一切过失，倘若这些过失曾使教会反感的话，我请求上帝和教会原谅。

伏尔泰在这个信仰声明中，仍未明确表示他对天主教和教会的态度。他想以此声明蒙混过关。但遗憾的是，教会对他的声明仍不满意，认为它并没有表明对天主教的信仰。

1778年5月30日的晚上，伏尔泰生命已到最后阶段。神父来到他的病床前，请伏尔泰进行临终忏悔。伏尔泰问他：“你是谁？是谁派你来的？”神父答道：“我是上帝派来，聆听你的忏悔的神父。”伏尔泰拿出他最后的幽默，说了一句：“那么拿出你的

证件来，验明正身。”这就是伏尔泰一生的写照。他的生命以一个玩笑开始，又一个玩笑结束。

伏尔泰于当晚去世。他的敌人们没有放过他，巴黎政府和教会都不允许把他葬在巴黎。他的亲友们只得把他秘密地葬在香槟省。也许这倒是能令伏尔泰满意的，因为这里距离他和爱米莉曾经在一起幸福生活过的西雷并不远。

伟大的人物总是会得到人们的崇敬。法国大革命中，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对伏尔泰表示了极高的敬意。1791年5月8日和30日，国民议会两次发布公告，决定把伏尔泰的遗骨迁葬先贤祠，并补行国葬。7月10日，即伏尔泰遗骨安葬日，被当时的革命党人定为国家的正式节日。伏尔泰的心脏装在一只盒子里，存放在巴黎国家图书馆中。在这只盒子上刻着这样一句话：

这里是我的心脏，
但到处都是我的精神。